

臺灣近五十年詩經學研究概述¹

一九四九～一九九八

The Last Fifty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Odes* in Taiwan,
1949 — 1998

楊 晉 龍 (Yang Chin-lung)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 提要

本文以析論臺灣近五十年的詩經學成果、背景、特點、問題及未來發展為主，希望透過實證的分析，以選擇優棄弊，提昇臺灣詩經學整體的研究水準。

根據初步統計，臺灣五十年來共有 685 位學者，發表單篇論文 2094 篇、學士論文 9 篇、碩士論文 93 篇、博士論文 15 篇、專著（含論文集）143 部。由於教育的整體發展，中文相關系所的增加，學術要求的提昇，故論著數量愈來愈多。呈現的內容以文藝賞析、語言文字相關研究、先秦、兩漢、孔子、朱子等的研究較多；以文獻學、詩教、詩樂問題、六朝、五代、元代最少。表現的特點是：研究者的層面寬、涉及的議題廣泛、資料的蒐集認真、內容漸趨向精細；出現的問題是：專業精神不足、內容還有偏向、資料猶有遺漏、批評不盡客觀、方法缺乏變化等。未來發展除發揚特點、改進出現

的問題外，由於多元文化、開放心靈的社會與反科技獨霸思潮之形成；針對「後現代」文化運動的檢討；以及研究者之自我反思、兩岸交流之互補、相關學科回顧性檢討之吸收等等的影響，臺灣詩經學在整體學術水準提昇的大環境下，必然走向開放、多元、專精、創新之途。

本文的研究不但有助於對臺灣五十年來詩經學成果的深入瞭解，而且還分析影響發展走向的相關因素，對未來的發展提出積極性的分析意見。這些成果也彌補了前賢研究的不足，特點與問題的提出，更可以提供學者檢討反思，對臺灣詩經學的發展與研究水準的提昇，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也是本文的目的與價值所在。

壹●前言

本文從「文獻目錄學史」的角度，以瞭解臺灣近五十年來詩經學發展的實況，及促成詩經學發展的背景和

1 本文係筆者《臺灣光復後詩經學研究》一書之節稿，故標題稱為「概述」，文中部分資料與論證亦因節省篇幅而未曾充分展開，詳細之論證與資料請參見該書。該書部分內容曾以《臺灣近五十年（1949-1998）詩經學研究初稿》為名，於 2000 年 1 月 24 日在中研院文哲所發表，蒙金春鋒、戴璉璋、李明輝、劉述先、林慶彰、李豐楙等諸先生；暨王璦玲、衣若芬、劉苑如等同人，提供甚有價值之高見，部份意見已表現在本文中，謹此致謝。李明輝先生建議將標題之「詩經學研究」改為「《詩經》研究」，就較嚴格之「學」的意涵要求言，李先生之言可從。唯本文乃取比較寬鬆之意義，故未從命，謹此說明，並感謝李先生惠賜之卓見。



主要因素，又觀察其特點與問題，最後分析影響未來發展的相關事項。研究的主旨重在成果的認識、介紹，故對「詮釋研究史」重視創見、或「傳播研究史」重視流傳和承先啓後關係等的研究成果，均加以分析探討，有別於僅主觀選擇幾家符合自己觀點而作臧否的研究方式。

「臺灣」一詞爲學者身分之限制詞：或出生在臺灣且在臺灣長期從事學術活動者、或長期居住臺灣且學術活動主要在臺灣地區進行者（包括退休後歸化爲外國人者）、或非出生與長期居住而在臺灣接受高等教育之際發表論文者、或身居域外而未歸化爲當地人且在臺灣地區發表論文者、或出國後又回臺任教而在臺灣發表論文者。依此原則：香港、大陸、亞歐美地區等華人學者，雖在臺灣出版、發表論著，皆不列入；身分限制前兩項之學者則無論在何處發表，皆列入（唯在國外留學時的學位論文不計入）；外國留學生在臺灣完成的論著亦列入。「五十年（1949-1998）」是時間限制詞，在此時限外發表的，均不列入討論。因主旨重在「研究的發展」，故舊作新刊者，亦排除在外。「詩經學」係「經學」之分支，「經學」的定義與研究範圍，自可適用於「詩經學」。李威熊說：「凡成系統，有修貫之學術，即皆謂之學，因此，把諸經看成一門學問，作系統研究，如經傳的名物訓詁，或剖析其義理，或探討群經源流發展歷史，以及經書上種種問題的研究等，都包括在經學的範疇」；²程元敏在「中國經學史」課堂上說：「凡歷代學者依傍經書整理、選擇、解釋之外，又以自己的思想增益、減省、發揮諸經的學說等相關著作，均屬經學研究的對象及範圍」；³林慶彰「經學史」的觀點是：「一部經典形成後，後人一切相關研究的成果，包括經典的注釋，個別字義、典章制度、思想內容的探討，和相關論著目錄、論

文集、叢書等的編輯，都可以說是該部經典研究史探討的對象」；⁴岑溢成謂：「從研究對象來看，『經學』的性質十分單純，專指研究《四書》、《五經》或《十三經》等經書的學問。可是經籍的內容卻很複雜，於是由文字訓詁、典章制度，到經國濟世、天人性命的道理，無不包羅在『經學』的範圍之內。對於相同的經文，不同時代、不同的經學家，都可以根據自訂的研究立場、目標、課題、方式，形成不同的經學觀，並在這基礎上，進行不同的探討，獲得不同的成果。」⁵這些觀點已與「傳統經學」專重倫理教化的內涵和實踐要求的意義有別，是爲「現代經學」的意義與範圍。本文不僅注重「傳統經學」意義的「詩經學」；也重視「現代經學」意義的「詩經學」，故將內涵訂爲：整理或發揮與《詩經》相關的種種問題之系統研究，包括詩教、名物、文法、文字、聲韻、訓詁、義理、史實、賞析、註譯、目錄、版本、源流、發展等等的研究，探討的內容則是上述研究「發展」的狀況，屬「經學史」內之「詩經學史」研究。

回顧臺灣學術的研究成果，以及對臺灣學術發展的期望，並不是一件新鮮的創見，在筆者寫作此文之前，與臺灣詩經學回顧和展望相關的研究，至少有下列七篇論文，依序是：一、張學波〈六十年來之詩學〉；⁶二、林慶彰〈詩經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⁷三、林慶彰〈臺灣近四十年（1953-1992）詩經學研究概況〉；⁸四、夏傳才〈繼往開來把現代詩經學提高到新水平〉；五、王麗娜〈《詩經》在海外〉；⁹六、張啓成〈海外與臺灣的詩經研究〉；¹⁰七、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研究的發展〉等。¹¹張學波之文討論中華民國成立六十年（1912-1971）來的詩經學成果，因此包括早期大陸地區學者的論著，唯此文介紹說明非常簡略，未能較深入分析

2 李威熊，《中國經學發展史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頁3。

3 程元敏1989年9月25日臺大上課筆記。

4 林慶彰，〈詩經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鍾彩鈞主編，《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2），頁349。

5 岑溢成，《詩補傳與戴震解經方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3-4。

6 張學波，〈六十年來之詩學〉，程發軔主編，《六十年來之國學》（臺北：正中書局，1972），第1冊，頁305-361。

7 林慶彰，〈詩經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同註4，頁349-382。

8 林慶彰，臺灣近四十年（1953-1992）詩經學研究概況，中國詩經學會編，《1993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4），頁27-41。

9 夏傳才與王麗娜二文均見《河北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2期（1993年6月），夏文見頁50-54、王文見頁63-70。

10 張啓成，〈海外與臺灣的詩經研究〉《貴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1995年4月），頁49-53。

11 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研究的發展〉，「第四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山東濟南：1999年8月）。



相關背景，指出比較重要的特點與問題。林慶彰兩篇論文，分析探討戰後臺灣四十年（1992 年以前）來詩經學的特點、缺失、與未來的展望，研究成果較為深入確實，這與林先生長期注重文獻目錄學和經學的研究，尤其編輯經學目錄的背景有絕對密切的關係，這與某些研究者毫無目錄整理的背景，純任想像主觀而大作回顧性研究者不同，蓋此種無目錄整理背景的研究，容易受主觀感覺意見的左右，故臆測性高而實證性弱。由於林文實證性較強，以及兩岸猶存在時空隔絕的因素，因此三位大陸學者的論述皆受到影響，僅在枝節上稍有異見，唯夏傳才稍補入近年（1993-1998）的研究成果，然不免存在一些小問題。考察以上諸文，多從宏觀鳥瞰的角度入手，較無法照顧學術相關背景的說明，也缺乏實際統計的資料支持，在取證的要求上稍有不足。本文乃在前述諸文的基礎上，承繼其成果而補其所略，以比較確實的統計資料，如實地呈現臺灣近五十年來詩經學的成果，並論其良窳及前瞻焉。

研究進行的方式，首先分析臺灣五十年來影響學術研究的相關背景：政治、經濟、教育等因素的變化；其次統計研究成果的數量，然後按照時間先後，以十年為期，觀察其數量上的變化；再分析影響其變化的相關因素；最後回顧研究成果的內容，指出其特點、問題，以及在各研究領域內比較有貢獻和發展的學者，並在「反思與瞭解」的大原則下，提出繼續發展時影響的事項。

取用的資料，除前述七篇文章之外，有關論著的書名、標題及內容大要，主要取自：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92）》與尚未出版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93-1997）》等三書；¹² 及中研院圖書查詢系統、國家圖書館、國科會科學資料中心、大陸委員會等網站，各大學及圖書館搜尋系統。歷史及教育、經濟、人口等背景資料，參考中研院臺史所「臺灣研究網路化」、國科會、教育部、主計處等相關網站；及大陸學者劉國新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長編（1949-1994）》。¹³ 又以「詩經」為題，進入蕃薯藤、雅虎等網路搜尋系統進行搜尋。

貳●臺灣學術發展的背景

影響臺灣學術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內在的：文化傳統、學術思潮、社會評價、及學者個人選擇等等；外在的：執政者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文化政策、以及整體經濟發展的狀況等。本文的背景指外在諸相關因素而言，這些因素誠然不僅僅影響「詩經學」而已，但相對於大陸對「經學」的藐視破壞，討論「詩經學」在臺灣的發展，這些因素還是具有重要的意義。以下即討論影響臺灣學術發展的大環境因素。

一、政治的影響

1945 年 8 月日本軍國政府懾於「原子彈」的威力，宣布無條件投降，臺灣重回中國的統治，但由於主政的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地區敗給共產黨，而退守到臺灣，爲了保持其政權的延續，鞏固其反攻最後基地的安全，遂於 1949 年 5 月在臺灣地區頒布《戒嚴法》，實施「戒嚴」，¹⁴ 執行嚴格의思想和出版品檢查，制定《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管制人民的言論自由和學術研究的自由，同年 11 月即有查禁「反動書刊」之事，1953 年 10 月更出現通令各機關學校圖書館審查藏書，將「反動書刊」銷毀的「焚書事件」。所謂「反動書刊」並不一定與政治有關，只要是作者的政治立場與國民黨不同，或是沒有跟隨國民黨到臺灣而滯留在大陸者，多數均被列入黑名單中，於是大陸學者的舊著與新作從此無法在臺灣公開傳布，只能在少數單位或地下流傳，兩岸學術的交流因而被政治截斷。

1979 年元旦大陸政權主動發表〈告臺灣同胞書〉，表達通商、通航、通郵等「三通」的意願，臺灣政府隨即以「三不」政策回應，不過兩岸「漢賊不兩立」的敵我關係卻也逐漸獲得改善。於是 79 年 6 月籌設而成立於 81 年 9 月的「漢學研究資訊中心」，乃允許學者與研究生在館內閱讀收藏的大陸出版品。1986 年 3 月國民

12 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92）》（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89 與 1995）及尚未出版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93-1997）》。

13 劉國新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長編（1949-1994）》（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14 以下年代皆以西元為準，故省略「一九」兩字。



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有限度允許大陸出版品在臺灣流傳、及兩岸學術文化交流活動，大陸出版品纔獲得公開傳布的認可，各大學的圖書館於是開始購藏且允許學生借閱大陸出版品。1987年7月正式解除了「戒嚴」，1988年7月新聞局制定新的「大陸出版品管理要點」，允許學者私人購藏大陸圖書，大陸學者的著作纔獲得自由流傳收藏的認可。這是政治影響學術比較負面的實例，其作用則在兩岸學術的傳承與交流上。

蔣介石是這五十年內影響臺灣政策走向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觀念對臺灣學術發展因而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蔣介石發表於1952年10月的〈反共抗俄基本論〉中，特別強調共產黨對民族文化的破壞：「倫理道德，亦將被其毀棄盡淨」；¹⁵ 1953年11月發表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也譴責共產黨「破壞國民的美感和倫理觀，達成他毀滅中國民族文化的目的」。¹⁶ 相對於共產黨的破壞毀滅中國傳統民族文化，蔣氏強調他繼承的是：「用孔子的理想」為理想的「三民主義的思想」；¹⁷ 還特別指明三民主義的精神是：「我們歷史文化的正統，歷數千年一直傳下來的」、孫中山的基本思想則「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所以是「孔子以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¹⁸ 根據蔣氏自認為孫中山正統傳人的論述，則他自然就成為中國文化「正統」的傳承者，蔣氏沒有直接說出，蔣經國乃代其父說出，謂其父之思想：「繼承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國父這一脈相承的思想。」¹⁹ 於是國、共兩黨的政權之爭，儼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生死存亡的鬥爭：共產黨是破壞與毀滅中國傳統文化的罪魁禍首；蔣氏則成為中國文化正統的傳人與最高的維護者。蔣氏既然以

「正統學術思想的維護者」自居，²⁰ 強調「繼承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國父這一脈相承的思想」，「這一脈相承的思想」當然是與儒學相關的思想，²¹ 儒學思想的核心是經學，詩經學為經學的一支，在政治強力干涉學術的戒嚴時期，無形中也受到「肯定」，相對的也比較容易受到支持，臺灣最早的一本詩經學專著：屈萬里的《詩經釋義》，即由與政府關係密切的「中華文化出版委員會」出版；成立於67年7月大力推動「古籍今註今譯」的「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更是半官方性質的機構。這是政治影響學術比較正面的例證，其作用是政府對所認可的學術思想之推動與發展，給予政策和經費上的支持。

臺灣近五十年來政治影響學術有：一則阻絕兩岸學術交流，兩岸研究成果無法有效的傳布、討論，學術上應有的瞭解和互動受到嚴重的影響。再則蔣介石以重視文化傳統作為和共產黨鬥爭的手段之一，傳統文化核心的經學研究，在「戒嚴時期」執政黨自居於傳統文化繼承者與維護者的前提下，無形中也就相對的擁有比較大的自由研究空間，以及獲得比較多的研究資源。

二、教育政策的影響

國民黨政府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者與維護者自居的立場，也在其教育政策中顯現，蔣介石就一再強調「教育」要「恢復中國固有高尚的倫理道德」，²² 在課程內容的設計上：中、小學有「公民與道德」的課程，高中有「國學概論」與以《論語》、《孟子》為主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課程，大學院校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關的系所，除中文系、語教系、國文系之外，如歷

15 蔣介石，〈反共抗俄基本論〉，《先總統蔣公言論選集：反共復國的理論與實踐》（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頁6。

16 蔣介石，《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編訂：《國父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第1冊，頁277。

17 蔣介石，〈反共抗俄基本論〉，同註14，頁88。

18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領袖政治思想》（臺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66），頁27。

19 蔣經國，《蔣主席言論集：勝利之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頁235。

20 《領袖政治思想》，同註17，頁78-79。

21 國民政府自居為儒學文化的維護與傳承者，一直影響到李登輝前總統，李前總統在1999年12月4日出版的《哈佛國際評論季刊》（*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所發表的〈儒家的民主：東亞政治現代化〉一文中，即特別肯定儒家在「尊重個人」、「主張人治與法治應互相配合」、「提出一套以教育為核心的價值理念」等三方面：「對民主制度提供助益」。可見國民黨自蔣介石以來重視儒學傳統的立場。文見《中央日報》1999年12月8日第2版朱駿剛、涂志堅譯文。

22 見《先總統蔣公言論選集》，同註14，頁72；頁125、頁181近似。

史系、哲學系或比較文學系等，也多開與傳統文化相關的課程；由小學到大學必修的「國文」和「歷史」相關課程的取材與敘述上，更貫徹著執政黨維護傳統文化的主要政策。這些對傳統文化正面肯定與評價的論述，對一般學子具有引發興趣、產生瞭解期望等正面鼓勵的作用，在普及教育的潛在功能上，也有一定的效用，這或許是臺灣長期以來，民間一直不斷有「讀經」活動，和出版經學相關「善書」，甚至由〈秦風·蒹葭〉改寫而成的歌曲〈在水一方〉，也能廣泛流行的內在因素之一。

蔣介石不但重視傳統文化的發揚，也瞭解「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教育為立國根本，也就是國家和政府對下一代的責任」；又說「心理建設為一切建設之母」，而「心理建設之方法為教育」；更強調「教育的優劣成敗，即國家民族興亡盛衰最大的關鍵」，²³ 這些觀點或如龔鵬程所云，係在政治指導原則下的「文化工具性價值的利用」，而非對於文化具有「真切的興趣與理解」，²⁴ 過無論蔣氏的居心如何，然對教育發展的確起了正面積極的功用。49年臺灣省主席陳誠即宣布「普及國民教育」為政府主要的施政方針，1968年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兒童就學率由光復初期的近71%；到1954年的超過90%；1975年的超過99%；1986年以後更接近100%。學校數量亦由1946年的1130所小學、214所中學、4所大專院校；至1998年的2557所小學、715所國民中學、242所普通高中、201所高級職校、53所專科學校、45所學院、2所空中大學、39所綜合大學，其中高等教育（大專院校）包括841個研究所、1842個系、1272個科。大專院校的學生人口由1950年的6665人，成長到1998年的3,618,000人。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學校數量成長34.35倍、學生人口增長542.84倍。若以總人口中就讀高等教育的人數來看，1951年每千人僅有1.04人、1998年則有40.66人，成長39.10倍。而人的增長自1949年的7,026,887人、到1998年的219,28,591人，僅成長3.12倍而已，可見臺灣教育大幅度發展的實情。與學術研究

關係最直接的大專院校教師，專任教師從1951年的1118人，增加到1998年的40,149人，成長了35.91倍；1998年的專兼任教師共有63,102人（兼任有22,953人），這龐大的教師群，也包括了詩經學的研究者在內。

和詩經學發展關係比較密切的中文相關系所，1951年以前僅有臺灣大學與省立師範學院（臺灣師範大學前身）兩系，1998年則有：大學部58系、碩士班20所、博士班13所。中文系所多開有《詩經》的課程，研究所考試也有將《詩經》列為選考科目之一者，中文系所大幅度的成長，對《詩經》的研究與傳播當然具直接促進的作用。

傳統文化的重視、課程內容的相關設計、教育的重視與擴充、就學人口的增加、各級學校的增長、尤其高等教育的發展，均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詩經學的發展。除中文相關系所直接的影響外，各級學校的「國文」教師多出自中文相關系所，學校增加，國文教師需求跟著增長，大學院校的班級和學生加多，接觸《詩經》的人口跟著增多，研究或對《詩經》有興趣的人口跟著增加，必然影響到詩經學的發展。

三、經濟因素的影響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是無法馬上回收的投資，因此與經濟狀況的良窳關係密切。黃俊傑曾舉傳統中國科舉考試中舉的前三名多出自「經濟繁榮的江南地區」；與美國大學多分布在經濟精華地區的實例，認為「教育與文化發展的水準，與經濟的繁榮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說「教育的發展與經濟的繁榮實有其深刻之相關性」；²⁵ 林玉体更明白的說：「教育本來就是有閒階級的專利品，有『閒』階級就是有『錢』階級」，²⁶ 這可以看出教育與經濟的密切關係。

教育既然與經濟關係密切；學術發展又與教育脫離不了關係，因此經濟影響學術也就不言而喻了。人文學術研究比教育投資更難見具體的回收效果，如果經濟發展欠佳，國民收入太低，社會資源不足，就很難有餘力

23 見《先總統蔣公言論選集》，同註14，頁249、頁124-125。

24 龔鵬程，《四十自述》（臺北：金楓出版公司，1996），頁406。

25 黃俊傑，〈從當前臺灣高等教育脈絡論大學與產業界之關係〉，《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臺北：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1999），頁390-391。

26 林玉体，〈教育與人類進步〉，《教育與人類進步》（臺北：問學出版社，1978），頁16。



支持人文學術的研究。經濟狀況如果太差，教育投資就會減少，學校的硬體設備不足，受教育的人也少，投入研究的人自然不多，研究群體就太小，從經濟的因素分析，購買出版品者少，出版單位自然不樂意出版，論著的發表與流通就受到限制；再者沒有經費的支持，需要的書籍或設備無法獲得，不但研究計劃無法推展，學術會議的召開和參與、論著的出版都會受到影響，可見經濟影響學術之一斑。臺灣的教育與學術發展，與臺灣經濟的發展脫離不了關係，以下即論述臺灣經濟發展的情形，及與教育發展的關係。

臺灣經濟發展的奇蹟，是世界公認的事實，哪些因素影響經濟發展與教育、學術之間的關係呢？林向愷曾分析衡量國家經濟實力的指標因素，認為「衡量一國經濟實力，不僅在它的國內生產毛額，而是它的每人平均所得水準。也就是說，國民的購買力纔是經濟實力的表現」，²⁷ 影響教育投資與學術研究的經濟因素，應該就是代表國民財富的「每人平均所得」。臺灣的「國民每人平均所得」在1951年是137美元、1976年為1041美元、1997年為13233美元、1998年略降為11306美元，已超出發展中國家9600美元的標準，若以1951年和1998年比較，國民每人平均所得增長82.53倍。與學術研究關係較密切的家庭電腦普及率，1987年為3.6%、1998年為32.3%，十年間成長8.97倍，從這些數據即可看出臺灣經濟發展的傲人成果。于宗先研究臺灣經濟成長後和教育的關係，他發現「在臺灣經濟快速的發展過程中，最明顯的現象乃一般家庭的成員都受了相當高的教育，而且教育水準還繼續地在提高。一般中等所得的家庭都有能力將子女送進大專院校去讀書」；²⁸ 孫震的研究也認為改善了所得分配之後，「使很多貧窮家庭的子女和富有家庭的子女有同樣受教育的機會。教育普及使潛在的能力得以發展，使社會流動性提高」，孫先生更以為「對教育和知識的熱烈追求」，是臺灣居民共有的「內在

特質」，²⁹ 這些相關而互相影響的因素，促使臺灣的教育持續發展，並影響到整個學術的發展。另外臺灣為求長期科技與經濟之發展，政府成立了推動「科技發展」的專責機構，自1959年的「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到1967年的「國家科學委員會」、69年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均編列預算獎助學術研究，開始雖以獎助理工農醫等科技類為主，後來擴及人文學科，尤其自69年起的「國科會」，對論文的獎勵、研究計畫、國際性會議的召開或參與等經費的補助，對人文學術研究發展的幫助相當大。這些政策若無充裕的經費，政府即使有心也無法順利推行，這也是經濟影響學術研究的另一項例證。

政治、教育、經濟等三項因素，互相作用、互相配合、互相影響的結果，成為促進臺灣學術發展的重要契機，臺灣五十年來的詩經學即在此一大環境下，獲得一個相對上比較優良、而可以正常成長的研究發展空間。在整個學術研究的重視與投資的關注程度上，前教育部長毛高文就坦承「政府在教育、研究各方面施政的推動，多少偏重在科技方面的發展，而比較忽略人文社會這方面的整體發展規劃」，³⁰ 不過也必須客觀的承認在四九年以後的五十年間，人文學術的研究固然受到不該有的歧視，在經費投入和關心重視的程度上無法與科技實用類相比較，但人文研究的學者在實際的表現上，仍然有長足的進步，研究成果也相當輝煌而具有自己的特色，詩經學的表現自不例外，這就是下文要繼續探討的主題。

參 ● 「數量」的統計與分析

臺灣近五十年詩經學的研究成果，根據前述資料「初步」統計，³¹ 相關數據如下：單篇論文2094篇、學士論文9篇、碩士論文93篇、博士論文15篇、專著

27 林向愷，〈由政治經濟觀點看兩岸經貿活動是否應予規範〉，《現代學術研究》專刊9（1999年6月），頁46。

28 于宗先，〈經濟轉型期的家庭關係〉，《經濟發展啟示錄》（臺北：三民書局，1990），頁326。

29 孫震，〈臺灣經濟發展的經驗與啟示〉，《邁向已開發的國家》（臺北：三民書局，1990），頁111、〈向已開發國家邁進〉，頁100。

30 毛高文，〈專題演講〉，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編：《大學人文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大學人文教育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92），頁1-3。

31 稱「初步統計」乃因有下列幾項問題還未解決：（一）單篇論文散見各處，難免有遺漏；（二）博碩士論文交出版社出版，算一書或二書？（三）學士論文無法收集完整；（四）「導讀」、「概論」等一類相關書籍中《詩經》的部分，是否要列入計



(含專書與論文集，以下皆同) 143 部、卡帶一捲(臺灣電視公司的《溫柔敦厚話詩經》)、CD 一片(魏子雲：《詩經吟誦與解說》附)，全部論著係由三個編輯單位與 685 位學者完成。

學者個人發表「條目」的數量，³² 20 條以上依次是：許世瑛(212 條)、劉明儀(江甯，189 條)、吳宏一(120 條)、裴溥言(89 條)、李辰冬(76 條)、趙制陽(60 條)、糜文開(56 條)、王禮卿(30 條)、林慶彰(29)、潘重規(23 條)、程元敏(21 條)等 11 位；投入研究超過四十年者僅龍宇純 1 人；超過三十年者：趙制陽、王禮卿、程元敏、余培林、王靖獻、劉明儀等 6 位；超過二十年者：陳新雄、林慶彰、文幸福等 3 人；超過十五年者：吳宏一、洪國樑、黃忠慎、林耀潏、季旭昇、江乾益、朱守亮等 7 位。以上這些發表數量較多、及投入研究時間較長的 22 位學者，對臺灣詩經學的發展，具有比較大的影響與貢獻。近來投入研究而較有成績者有：竺家寧、藍若天、林明德(輔大)、蔣秋華、林葉連、黃肇基、呂珍玉等 7 人；在 1986 年獲得博碩士學位後至今猶繼續不斷發表相關論著者有：陳昀昀、陳文采、張寶三、林奉仙、趙明媛、徐富美、歐天發、侯美珍、丁亞傑、楊晉龍等 10 人。這 17 位新投入者與前述 22 位學者、加上其他有興趣的學者，共同成就了臺灣詩經學發展的實貌。

為瞭解這五十年來臺灣詩經學的變化，今以每十年為一期，觀察不同階段論著數量的多寡。論著中有 4 本書和一捲卡帶出版時間無法確定，故不列入計算。其他論著分布的情形如下：(一) 1949 至 1958 年：單篇論文 76 篇、學士論文 1 篇、碩士論文 2 篇、專著 7 部；共 86 條條目。(二) 1959 至 1968 年：單篇論文 178 篇、學士論文 6 篇、碩士論文 6 篇、博士論文 1 篇、專著 13 部；共 204 條條目。(三) 1969 至 1978 年：單篇論文 614 篇、學士論文 2 篇、碩士論文 18 篇、博士論文 1 篇、專著 35 部；共 670 條條目。(四) 1979 至 1988 年：單篇論文 603 篇、碩士論文 27 篇、博士論文僅 2 篇、專著有 53 部；共 685 條條目。(五) 1989 至 1998 年：單篇論文 623 篇、碩士論文 40 篇、博士論文 11 篇、專著 31

部；共 705 條條目。從論著數量消漲的情形，可以看出幾個特點：(一) 學士論文甚少，第四期後即絕跡；(二) 博碩士論文呈成長趨勢，尤以碩士論文為甚，博士論文第五期為第二期的 11 倍，碩士論文成長 20 倍；(三) 單篇論文成長驚人，第三期為第一期的 3.5 倍、第五期增加為 8.20 倍；(四) 專著數量第三期為第一期的 5 倍、第四期暴增至 7.58 倍。整體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就全部條目而論，第五期為第一期的 8.20 倍，可見成長幅度之大。

分析前述現象，學士論文主要是各校未認真保存；作者未重視，也無機會發表；再則教育制度改變，取消學士論文，數量因此不多。1966 年到 1977 年的十年間，正是大陸以「破四舊、立四新」為主旨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國民黨政府為凸顯其捍衛文化傳統的地位和決心，在 1967 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全力推動傳統學術的研究。如前所述，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中學師資多來自大專院校，間接促成高等教育的發展，大專院校教師大量增加；69 年「國科會」改組後對人文學科經費的補助增加，刺激研究者提出更多的研究計劃；教育部在 75 年施行「大學評鑑制度」，教師發表論文的數量為評量的項目之一，學校因而獎勵教師發表論文；76 年以後臺灣國民個人平均所得已超過一千元美元，且持續增長到超過一萬美元的水準，圖書館和學者個人購買出版品的經濟能力因而大增；82 年起政府為鼓勵研究，給予大專院校研究成績優良教師每月兩萬元之獎金；86 年以後兩岸開始學術交流活動，學術會議的召開非常熱絡。這些相關因素即促成第三期以後論著數目大量增長的原因。

影響臺灣詩經學的發展，比較直接的因素，應該是中文相關研究所的設立，培養博碩士研究《詩經》相關的論題。自臺灣師範大學在 1956 年設立碩士班、1957 年設博士班後，至 1998 年止，共有十五校十五個所的碩士生、六個所的博士生曾選擇和《詩經》相關的主題撰寫論文。十五校依其論文數量的多寡排列是：師大(博：5 篇；碩：15 篇)、臺大(博：2 篇；碩：15 篇)、文化(博：1 篇；碩：13 篇)、政大(博：4 篇；碩：

算？(五) 博碩士論文中有關涉到《詩經》的章節，又要如何處理？(六) 電腦網站中的文章是否要收錄的問題；(七) 作者身份猶無法完全的確定；(八) 計入的論著或難免有重複計算的問題。所以僅能稱初步不精確的統計。

32 所謂「條目」指無論是單篇論文、學士論文、碩士論文、博士論文、論文集或專著，均以「一條」計算之，以下皆同。



9 篇)、東吳(碩: 11 篇)、輔大(碩: 7 篇)、東海(博: 2 篇; 碩: 4 篇)、中央(碩: 5 篇)、中正(碩: 5 篇)、高師大(博: 1 篇; 碩: 2 篇)、逢甲(碩: 3 篇)和成大、中山、中興、政戰學院(四校均碩: 1 篇)。前面十一校《詩經》相關論文出現後就持續不斷; 論文數量較多的前七校除東吳外, 均與研究所成立時間的早晚成正比; 其中 11 篇碩士論文出自歷史、哲學、外文、翻譯、藝術等所; 政戰學院與輔大翻譯所兩篇論文係以英文寫作。

中文相關研究所增加, 固然有可能促進詩經學的發展, 但也僅是有可能而已, 因為還牽涉到研究生的意願, 研究生的選擇多與教授開課、和指導教授的專業研究相關。教授對詩經學的態度、及在詩經學專業上的成就, 影響到研究生的選擇。教授指導論文數量的多寡, 及所指導研究生分布之情形, 也可據以推論其影響的大小, 這是指導教授對詩經學發展的作用, 以下即統計詩經學相關論文指導教授的指導情形。

以單一學校指導的論文數量而論, ³³ 指導超過兩篇者: 「臺大」: 張以仁(5 篇); 程元敏(4 篇); 戴君仁和裴溥言(均 2 篇)。「師大」: 汪中(5 篇); 余培林(4 篇); 高明(3 篇); 劉正浩(2 篇)。「政大」: 朱守亮(4 篇); 李威熊(3 篇); 熊公哲(2 篇)。「中央」: 岑溢成(3 篇)。「中正」: 莊雅洲(4 篇)。「東吳」: 裴溥言; 朱守亮; 林慶彰(均 2 篇)。「輔大」: 王靜芝(3 篇)。「東海」: 楊承祖(3 篇); 龍宇純(2 篇)。「逢甲」: 李威熊(2 篇)。「文化」: 于大成(3 篇); 陳新雄和楊家駱(均 2 篇)等。以個人指導的論文數量而論, 超過兩篇者依次為: 李威熊和朱守亮(均 6 篇); 張以仁、王靜芝、汪中等(均 5 篇); 程元敏、于大成、裴溥言、余培林、岑溢成、林慶彰、莊雅洲等(均 4 篇); 高明、陳新雄、楊承祖等(均 3 篇); 戴君仁、楊家駱、屈萬里、王忠林、熊公哲、劉正浩、周何、王熙元、顏崑陽、簡博賢、龍宇純

等(均 2 篇)。以指導學校的分布而論, 超過兩所學校者: 屈萬里(臺大、東吳); 王忠林(文化、高師大); 陳新雄(文化、輔大); 王靜芝(文化、輔大、政大); 于大成(師大、文化); 朱守亮(政大、東吳); 裴溥言(東吳、臺大); 周何(師大、政大); 李威熊(政大、文化、逢甲); 王熙元(師大、東吳); 顏崑陽(高師大、中央); 岑溢成(中央、政大); 簡博賢(東吳、逢甲); 林慶彰(中央、東吳、政大)等。以上 26 位指導教授, 在臺灣詩經學的傳播與發展上, 具有比較重要的貢獻。

經由上述個人論著數量的多寡、投入研究時間的久長、新投入研究的新血、分期論著數量的變化、各校教授指導論文的數量、教授個人指導論文的數量、指導學生的學校分布等等相關因素的統計分析, 可以比較清楚的瞭解, 影響臺灣近五十年來詩經學發展比較重要的學者, 與其他諸相關的因素。除數量外, 在詩經學實際的表現上, 有哪些特別受到關注的議題? 研究的特點如何? 這就是下一節要探討的問題。

肆 ● 「內容」的量化分析

論著數量的多寡、分配和變化情形; 參與研究的人數、投入的時間、參與的情形等等, 固然可以幫助瞭解詩經學發展、流衍、傳播的情況, 卻無法得知研究成果的特點, 也無法瞭解這段期間詩經學者關注的重點, 只有將研究的內容加以分析, 纔有可能獲得答案。以下「略依」林慶彰《經學研究論著目錄·詩經》的分類方式, ³⁴ 就其「大類」統計論著內容分布的情形、再就「小類」分別析論之。

根據呈現的內容, 依其條目多寡的次序排列如下: 「內容價值類」780 條、「語譯賞析類」536 條、「基本問題類」500 條、「經學史類」382 條、「文獻學類」39

33 指導教授有兩位者, 其數量均分別計算之。以下跨類條文之數量亦同樣分別計算統計。

34 謂之「略依」者乃因以下諸條件不同故也: 一、「大類」全依之, 「小類」則不全依之; 二、風、雅、頌內賞析之文, 本文歸入「語譯賞析類」; 三、各篇與文法、句法、訓詁、聲韻、文字等相關的研究, 本文一律歸入「內容價值類」的小類「文字學類」; 四、「詩教」相關的研究, 本文在「內容價值類」下, 另立小類「倫理學類」; 五、「通論類」本文歸入「基本問題類」; 六、「詩經反映之文化風貌類」, 本文則依其性質散入相關類目中; 七、《左傳》、《論語》、《孟子》、《石經》、讖緯等研究, 涉及《詩經》者, 本文亦加蒐錄並散於各相關類目下; 八、「札記」一類, 本文則列入無法歸類的「其他類」中。

條、「其他類」117條。「文獻學類」最少，主要是臺灣學界多數不承認這類「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為學術服務的相關研究，投入者自然少；臺灣中文相關系所也不承認單純語譯為學術研究，故「語譯賞析類」沒有學位論文。更詳細的分類析論如下：

「內容價值類」可以再細分以下幾類討論。「文字學類」（文字、音韻、訓詁、文法、句法等）有445條：文字學類數量較多，表示臺灣學者對基礎研究的重視，同時也表現臺灣文字學相關研究發展的盛況。句法研究以許世瑛完成近兩百篇論文貢獻最大；戴璉璋除研究《詩經》詞類之外，也依據語法的認知修正前賢訓詁詮解上的訛誤，更以現代語法學知識，分別從構詞與造句兩方面歸納《詩經》的語法規律，用心最多；音韻則龍宇純、陳新雄、竺家寧貢獻較多。「史料學類」（民俗研究：神話、風俗、民謠等；歷史研究：史實、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動植物等；社會研究：政治、思想、感情、經濟等）146條和「文學藝術類」（修辭、表現的技巧等）112條：史料與文學兩類的相關研究，與「語譯賞析類」同是五四以來多數學者研究的重點，研究者多且論題分散，呈現比較普及的狀態。東海大學高葆光指導的學士論文有4篇與「社會研究」相關。「倫理學類」（詩教相關問題）65條：倫理學相關的研究是「傳統經學」的核心，「傳統意義」下的經學乃實踐之學，「詩教」呈現的倫理道德內容即實踐的要求，唯自民初「反傳統」思想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以後，有關「詩教」的研究，已成為那些不自覺的「西洋殖民學術思想者」揶揄嘲弄的對象，後學者在此種氣氛與趨勢下，除非對舊傳統有比較深刻的理解或堅強的信念，自不願投入這類研究，因之論著甚少，不過也表示「傳統經學」猶有生機，其中以戴君仁、文幸福、林耀潏、林葉連等的研究較值得注意。

「語譯賞析類」係五四以後較受重視的項目，由於排斥「詩教」觀點，《詩序》受到漠視，對《詩經》內容的詮解缺乏共識，人人均可隨意發表私見，自由自在的各說各話、自說自話；此類作品也是推廣普及個己觀點的重要管道，有異見或新想法的學者，可以透過此類研究傳達或發揮其觀點；初入門者也以此類習作來提昇程度；此類研究又可以單獨成文，研究範圍縮小，容易成篇，到一定數量又可以集結成書，一舉數得。相對於其他經書，《詩經》不但是傳統意義下的「經」；同時

也是現代人習知的西洋文化概念下的「文學」作品，還具有「民謠」的性質，五四以來對「文學」和對「人民性」的高度重視，無形中提昇了《詩經》的價值。民初以來「反經風潮」對《詩經》的影響，主要在《詩序》和「詩教」的爭論，並無礙於《詩經》為「中國最早詩歌選集」的共識，「語譯賞析」因而可以正常發展。因有上述諸原因，故出現了431篇「單篇譯文」、20本「選譯本」、33本「全譯本」、「中文翻外文」者4本、「外文翻中文」者4本、討論語譯內容的單篇論文44篇。「語譯賞析類」較有貢獻的學者是：屈萬里、裴溥言和糜文開（合著）、王靜芝、王禮卿、宋海屏、賴炎元、吳宏一、藍若天、余培林、黃忠慎、劉明儀等，其中劉明儀女士為一高中教師，自67年到98年間以「江甯」之名發表近180篇之譯文，並集結有兩本書，且至今猶在繼續發表，如此專注之精神，值得欽佩，以上諸人對臺灣詩經學的發展或傳播，具有比較重要貢獻。另外董同龢翻譯瑞典高本漢《詩經注釋》、杜正勝翻譯日本白川靜《詩經研究——中國古代歌謠》，對中外詩經學的交流亦具有重要的貢獻。

「基本問題類」有近30篇論文討論《詩經》作者問題，主要是師大教授李辰冬利用所謂「科學統計方法」，發現《詩經》是尹吉甫「自傳式」的私人作品，因而引發熱烈討論的結果。李氏之論當然無法成立，不過經由他的「新說」之刺激而引發一陣詩經學的研究熱，至少促成四本專書、八十多篇相關論文的出現，李氏的影響並非全屬負面。有關「篇名」的討論糜文開有5篇。《詩序》的研究：張成秋有單篇論文7篇、碩士論文1篇、專著1本，趙制陽有4篇論文。「賦比興」相關問題則：趙璧光、趙制陽、施炳華各有一本專著，蘇伊文1篇碩士論文、林奉仙1篇博士論文。「詩樂問題」有：白敦仁專著3本、論文1篇，何定生3篇論文。「淫詩問題」有陳茂進《鄭聲研究》；林保淳論證「淫詩」與「淫書」的關係；文幸福辨證孔子「放鄭聲」之義，與朱子「淫詩說」之誤解。「研讀和研究的問題」：除楊承祖、鍾克豪、胡安德、裴溥言、李辰冬、黃振民、周次吉、胡子成、蘇雪林等9人均有專著外，其他「經學」和「國學」一類之「概論」、「導讀」，以及不少單篇論文，也多有類似的內容；季旭昇則謂近代研究《詩經》有經學、文學、歷史語言學等三種觀點，以為歷史語言學之方法較其他兩種方法客觀、無成見、無爭議。以上即在「基



本問題類」的討論上，比較突出的幾位學者。

「經學史類」可再細分為通代、斷代（包括專家與專書），依研究冷熱的狀況，可以排列如下：通代研究僅有 7 條；斷代研究依次則：兩漢（81 條）、先秦（77 條）、宋代（71 條）、民國（51 條）、清代（49 條）、明代（20 條）、域外研究（14 條）、隋唐五代（8 條）、六朝（6 條）、元代（1 條）等。「專家與專書」的研究超出 5 條者，依次是：朱子（51 條）；孔子（41 條）；毛《傳》（35 條）；孟子、《韓詩外傳》（均 19 條）；李辰冬（17 條）；《左傳》（15 條）；王安石（12 條）；鄭《箋》、歐陽修、高本漢（均 9 條）；錢鍾書（8 條）；王夫之、姚際恆（均 7 條）；呂祖謙、裴溥言（均 6 條）；荀子、《經典釋文》、鄭樵（均 5 條）等。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較被重視的與較受忽略的議題。學者個人的成就則：程元敏對宋代王安石與王柏的研究最精；賴炎元對《韓詩外傳》的研究最專；裴溥言對宋代歐陽修的研究投入較多；許世瑛對朱子《詩集傳》音韻的研究最用力；黃忠慎對宋代的研究較注意；張易克（張喆）對李辰冬最為維護；趙制陽對歷代名著有比較深入的評介；潘重規對敦煌本《毛詩》的研究最重要，林慶彰、蔣秋華、楊晉龍等三人對明代研究的推廣最用心。這些即在「經學史類」相關研究上較有貢獻者。

「文獻學類」指有關目錄、輯佚、斟讎、版本、彙編等一類的研究。如前所述，早期臺灣學界不太承認這類工作的學術性，且這類研究的基本條件亦較特別，因之投入者不多，不過還是有不錯的成績：林明德有〈周南〉資料的彙編；陳文采有宋代、周浩治有魏晉南北朝的《詩經》著述考；程元敏有《三經新義·詩經》、黃美瑛有漢《石經·詩經》殘字的輯佚；賴炎元、瞿紹汀均有《韓詩外傳》的斟讎；裴溥言、楊子青皆有詩經學書目；前舉的林慶彰《經學研究論著目錄》和圖書館或單位「目錄檢索」的相關網站，均對臺灣詩經學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貢獻。

經由上述條目內容表現的論證分析，可見臺灣五十年來詩經學較受重視和某些被忽視的議題，以及各議題中成果比較可觀的學者，這些成果當有助於更深入瞭解臺灣詩經學發展的實情。

伍●研究的成果與貢獻

經由前述統計資料數量與內容的分析後，下文即更進一步的探討臺灣近五十年在詩經學個別議題上，學者研究的成果、貢獻。本節就以前舉 7 篇論文為主，增補必要之資料，再加以說明分析，以見學者在整體發展中之表現，唯為節省篇幅，故上節已較詳細析論者，本節則從略焉。

一、就培養和推動臺灣詩經學發展的動力言：

以培養基本研究人才言，有臺大的屈萬里；師大與政大的高明、林尹；輔大的王靜芝等三大學術系統。以各校開課或影響而言，除前述指導教授外，臺大另有何定生、楊承祖、洪國樑、張寶三；師大有賴炎元、文幸福、季旭昇；政大有程發軔、熊公哲；文化有糜文開、裴溥言、潘琦君、許端容；東海有高葆光、趙制陽；輔大有林明德；成大有蘇雪林、趙璧光、施炳華；逢甲有黃忠慎。

二、就《詩經》註譯的成果言：

以其書設定的閱讀對象與目的，及表現的內容而論，可以分成下列幾類加以討論。

1. 綜合諸說予以淺顯說明翻譯者：

這類著作的解說力求簡單明瞭，以普及為目的，而非以研究為目的。如：裴溥言《先民的歌唱：詩經》以適合中小學程度的淺近文筆，解說翻譯；與糜文開合著的《詩經欣賞與研究》，以西洋文學概念下的文藝觀點，深入淺出的賞析解說，亦以適合一般人士閱讀為主。鄭毓瑜《少年詩經》以真實活潑之情感，帶領青少年共享《詩經》中人類喜怒哀樂的心情故事。宋海屏《國風新譯》、《詩經新譯》及張壽平《詩經韻譯》以簡單之文字說明篇旨，並以韻文翻譯本文。馬持盈《詩經今註今譯》；張允中《白話註解詩經》；李一之《詩三百篇今譯》；賴炎元《韓詩外傳今註今譯》等均強調「白話」語譯。朱令譽《詩經讀本》、李農《詩經選讀》、黃錦堂《詩經今釋》、鄭昆《國語注音詩經》等，除強調「白話」語譯外，更加註「注音符號」。屈萬里《詩經選註》，選擇適合青少年興趣的詩篇，以較簡略之文字註解說明，並於艱澀之字

予以國語注音，亦可見普及性之考慮。這些著作的共同點，除普及教學的考慮外，對詩旨之詮解，多不從「詩教」的觀點，而從現代人「直接閱讀」的認知角度立論。

2. 發揮「詩教」之義理者：

張元夫《詩經述聞》與甯榮璋《詩經新義與人生哲學之研究》，強調「詩教」為《詩經》大意所在，以為研究者不應脫離發揮倫理教化之主旨。傅隸樸《詩經毛傳譯解》和黃漢宗《詩經新探》兩書，肯定〈詩序〉為孔門大義所在，不得另作他解。黃氏更極盡曲解之能事，以強調〈詩序〉為唯一之確解。王禮卿《四家詩旨會歸》謂「不敢廢〈序〉言《詩》，妄逞臆說」，³⁵是亦不廢「詩教」者也。

3. 標榜「純文學」精神之賞析者：

高葆光《詩經新評價》、周錦《詩經的文學成就》、林振輝《關關雎鳩：詩經精華賞析》（即《青青子衿：詩經選》）、劉明儀《詩經譯註》與《詩經欣賞選例》、符顯仁《詩經欣賞》等書，均特別注重「文藝」欣賞的內容與原則。

4. 突顯「愛情」主題之內涵者：

這類著作不但強調「文藝性」，更特別將他們認為與「情愛」有關的詩篇單獨選出翻譯解說，例如：黃錦堂《二千五百年前的愛情歌唱》、符顯仁《詩經裏的情歌》、黃朝仁《詩經婚前情詩》、藍若天《國風情詩辨義》等。這些著作多先肯定〈國風〉具有「民歌」的性質，且規定「民歌」僅能表達男女的感情，所以〈國風〉是歌詠古代男女愛情生活的實錄。他們所選的篇章也都在〈國風〉中，蓋〈雅〉與〈頌〉中較難找到符合他們既定觀點的篇章故也。

5. 突顯音樂功能的著作：

《詩經》具有音樂性係學者的共識，雖無法恢復古樂的原貌，然歷代均有譜曲之事。以現代音樂知識為《詩經》譜曲者有：金湘《詩經五首》、錢南章《詩經五曲》、劉德義《中國音樂文化之回顧：風雅十二詩譜研析》、魏子雲《詩經吟誦與解說》等。劉氏除回顧歷代譜曲之事

外，還為部分篇章語譯譜曲，以便演奏歌唱；魏氏則以探討《詩經》之音樂美學為主，並附有吟誦之 CD 一片。

6. 融貫諸說而正以己意者：

這類作品在解說翻譯之際，先審慎分析前人詮解的意見，研判其說與詩文符應的程度，再提出個人之觀點。就比較寬鬆的範圍言，所有現代人的詮解作品均可歸入此類，尤其和第 1 類最為接近。不過這裡重視的是在詮解過程中，明確表明「不專主一家」、及「直探《詩經》本義」為旨，而特別凸顯己見者。此類著作有：屈萬里為初步研究《詩經》學者而寫的《詩經釋義》（擴充後改稱《詩經詮釋》），此書出版最早，是影響臺灣詩經學發展最重要的著作。其他如：王靜芝《詩經通釋》「不拘一家之說，惟採其是者；或別具愚見，總以實事求是為主」；³⁶ 朱守亮《詩經評釋》「為集解性質，惟是是從」「撮取各家最精當之……解說於一書」「要以就三百篇本文，以探求其本義旨歸」；³⁷ 余培林《詩經正詁》與黃忠慎《詩經簡釋》二書亦持此態度而吸收前賢之成果以解《詩》，黃書解說稍簡略，又認為「《詩經》兼具經學與文學雙重身分與價值，有此認知，始可與之言詩」，³⁸ 是亦不廢「詩教」者；余氏在「興」義與字詞解說上頗有特見。李辰冬《詩經通釋》以《詩》來為其「《詩經》三百零五篇都是尹吉甫的作品，也都是他的自傳的「駭人聽聞的發現」「一字一句作證明」，³⁹ 其論固謬，然亦自以為是「實事求是」、「直探《詩經》本義」者。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吳宏一詮解《白話詩經》的態度，該書以商榷舊說入手，既不抹煞《詩經》之文藝性；亦不排斥《詩經》具有教化功能，以為「不必以今天大家通行的想法，來否定古代崇尚禮教的社會規範」。⁴⁰ 純就詩文可能之本義與寓意、及當時的歷史情境，考察分析，以定詩篇之旨意，並從文藝鑑賞的角度加以分析，比較持平的挖掘出古人的情感和思想的面貌，這是比較適當的研究態度。

7. 中外文翻譯的著作：

35 王禮卿，《四家詩旨會歸·凡例》（臺中：青蓮出版社，1995），第1冊，頁5。

36 王靜芝，《詩經通釋·凡例》（臺北：輔仁大學文學院，1968），頁3。

37 朱守亮，《詩經評釋·凡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頁1。

38 黃忠慎，《詩經簡釋·自序》（臺北：駱駝出版社，1995），頁1。

39 李辰冬，《詩經通釋·自序》（臺北：水牛出版社，1996），頁1。

40 吳宏一，《白話詩經·蠅螬》（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第1冊，頁326。



將《詩經》譯為外文者有：閻景銘《詩經英語釋義》，不僅翻譯並加以解說；陳慧文和石敏均有「選譯本」；康華倫（Castellazzi, V.）的 *Translation of the 詩經 Shijing into western languages* 一書，是最近的作品。

翻譯外文作品除前述高本漢《詩經注釋》、白川靜《詩經研究——中國古代歌謠》外，洪順隆翻譯吉川幸次郎《詩經國風》，似未受到注意。題馮作民編著的《詩經》，內容文字與杜正勝所譯白川靜《詩經研究》，雷同之處，不勝枚舉，恐係抄襲之作。

三、就基本問題的研究而論：

《詩經》的作者，除非有新資料出現，難有突破性的發現。〈詩序〉作者猶不出是否「衛宏」的爭論上；〈詩序〉淵源內容之研究，張成秋以為《詩經》「純係文學作品」，〈詩序〉是後世應用、曲解以發揮儒家「德化政治」思想的產物；陳新雄、戴君仁的觀點比較接近，以為〈詩序〉乃漢儒倫理道德教化下的產物，不但於文、於人、於事無礙，且有實際的社會功能，實不必非滅之而後快纔可；龍宇純更以為〈詩序〉的價值，並不因今人的同不同意而定，主張要廢置一篇〈序〉之前，應充分為其設想，不能純任主觀的標準：「本文看不出」，就斷言其鑿空胡說；⁴¹ 吳宏一以為漢儒之說不免迂曲，然於世道人心自有裨益，唯人亦是情感動物，自有愛與情之表現、流露，也不必把愛情的解詩方法，盡斥為離經叛道，⁴² 這應該是比較正確的態度。「編者」的問題，戴君仁以為係樂師所編；一般的共識是周代確有蒐集民歌之事，孔子曾整理過《詩經》。「風雅頌」的問題，屈萬里謂「雅」即「夏」，「大、小雅」即周人之樂歌。一般多以為「風」係各地民謠；「雅」「頌」多為士大夫所作；「雅」係宴飲慰勞之中原正聲；「頌」則是歌舞樂三合一的祭祀歌。「賦比興」的研究，「賦」的問題最單純，「比」也比較容易瞭解，「興」的問題較複雜。趙璧光、施炳華、趙制陽均有專書討論。屈萬里等主張「興」不

取義的觀點，經由徐復觀、蘇伊文、余培林、文幸福、林葉連、吳宏一等研究分析，已經被排除，可以比較確定的說：「興」兼「不取義」與「取義」，且意義複雜。「比、興」之別，吳宏一認為「比，是並列關係，是心中已有主意，而另外選擇形象相似的事物，來作喻體，來作比方，因此是以物喻物」；「興，則是前後關係，是由眼前的事物引起對另一事務的回憶或感觸，喻體和本體不必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是觸物起情」，⁴³ 此說對比、興分別的瞭解大有幫助。討論「正變」則僅有崔文娟碩士論文《中國詩學正變觀念析論》觸及之，以為「《三百篇》能入列為經，其隱微的意義主要是由『正變』這一術語所點明的」、「《三百篇》經學意義的取得和深化」，實是經由「毛鄭正變觀念的意義詮釋」後纔完成（頁 21）。「詩樂關係」除前述金湘、錢南章、魏子雲、劉德義等著作外；何定生析論《詩》與樂由合一而走向分途的緣由；白敦仁有三本專著，最為用心；李靖慧《詩經曲譜研究》也注意到《詩經》譜曲演奏的問題。

四、就「文字學」相關之研究而言：

這類研究在現代的意義上，是屬於「語言文字學」的研究，現代「文字學」的研究，已經失去傳統「經學」的意義，僅是為語言文字而研究，不必然與經學發生關聯，目的不一定是詩經學的，但對詩經學還是有相當的助益。相關成果可以分成幾方面來說：

1. 就字詞考釋言：

汪中訓「展」為「蹇」、「瘳」為「聊」；屈萬里訓「孺」作「濡」義為「滯久」、「徂」作「且」義為「多」、「罔極」義為「缺德」、「兕觥」為「角形酒器」……等等；林慶彰、龍宇純、余培林、季旭昇等釋「彼其之子」的「其」為名詞，或以為「姬」、或以為「晁」；洪國樑謂「況也永嘆」之「況」當作「茲」，義為「茲益」，即「一再長嘆」；⁴⁴ 吳宏一謂「于以」為「於何」即「在哪裡」之義，「可能是召南地區當時特有的語法」；⁴⁵ 余培

41 龍宇純，〈詩序與詩經〉，編輯委員會編，《文史論文集：鄭因百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上冊，頁 19-35。

42 吳宏一，《白話詩經·關雎》，同註 40，第 1 冊，頁 8。

43 吳宏一，《詩經與楚辭》（臺北：臺灣書店，1998），頁 111。

44 洪國樑，《詩經訓詁之「亦通」問題：屈翼鵬先生《詩經釋義》、《詩經詮釋》「亦通」例釋》（臺北：學海出版社，1995），頁 25-35。

45 吳宏一，《白話詩經·采蘋》，同註 40，第 1 冊，頁 101。



林以爲「于邑于謝」二「于」字皆作「於也、在也」、「于疆于理」二「于」字則作「於是」解；⁴⁶ 龍宇純謂《詩》中十個「于以」句爲「疑問句」，當作「于何」解，⁴⁷ 以上諸人係在訓詁上較有成績者。趙汝眞、趙海金、李三榮與史玲玲等亦從事《詩經》假借字之研究，探求其「本字」，以杜絕望文生訓之誤說爲目的，其中史氏較有成果。許玲、陳應棠、李雲光、劉光義等亦有字詞訓詁之作。季旭昇《詩經古義新證》從古文字學的觀點，對十九篇《詩經》字詞的訓釋，重新加以檢討，得出不少比較可信的解說，如：「以」字有「提契」、「夾帶」義；〈王風·采葛〉之「彼」義爲「那」而非「他」、「采」義爲「茂盛」；〈國風·破斧〉之「四國」僅能釋爲「四方」；〈大雅·江漢〉之「求」字當作「征伐」解等等，⁴⁸ 夏傳才以爲此法豐富了于省吾以甲、金文考訂訓詁的方法；也把創自聞一多的現代《詩經》詮釋學的方法論向前推進一步，亦即把樸學「廣徵博引、精密求證」的方法，與現代語言學的概念和邏輯推理相結合，以古文字學和考古學爲主導，仔細而條理分明地來考證字句的古義，求得確解」。⁴⁹ 頗推崇其成果。

2. 就音韻研究而言：

這類研究主要在探討《詩經》表現的押韻、或語音現象，實以《詩經》爲材料的音韻學研究，研究目的音韻學的成分高；詩經學的成分較低。研究者除前述許世瑛、龍宇純、陳新雄、竺家寧外，謝信一從朱子《詩集傳》「叶韻」說研究當代的語音現象；賈禮研究《毛詩》的用韻現象；符濟梅糾正段玉裁《詩經》十七部分韻之誤；鄭寶美補正孔廣森《詩聲類》分例之不足。許美齡有《詩經韻部說文表》；江舉謙有《詩經》韻譜之作；張允中和馬輔則爲《詩經》標注出韻部。

3. 就文法、句法等研究言：

除前舉許世瑛、戴璉璋外，杜其容有「連綿詞」研究；張鏐鋒有「指稱詞」研究；歐秀慧研究「擬聲詞」；黃章明有「疊字」研究，這些研究對古代語法、修辭和《詩經》賞析的深入、情意的瞭解，均有莫大的助益。

五、就思想性的研究而論：

陳鼓應分析詩篇反映的情境，得出當時民眾對政治敗壞與道德墮落、兵役勞役頻繁等的憤怒心情；林慶彰發現從〈周頌〉的「頌天」、〈大雅〉的「疑天」、〈小雅〉的「咒天」、到〈國風〉的「不理天」，只關心「自身」問題的詩篇內容之變化；鍾洪武分析探討詩篇中的男女情感問題；林佳蓉討論〈雅〉、〈頌〉中表現的周人之德治思想；朴忠淳分析詩篇中表現的人生觀；劉慶順比較伊利亞得（The Iliad）與《詩經》中表現的英雄主義。這些著作比較深入探討了詩篇表現的情感、人生觀、政治思想等，有助於對周代社會與個人思想的瞭解。

六、就與周代歷史相關的研究論：

以詩篇的記載論證周代的史實，李辰冬《詩經通釋》即錯誤的認定《詩經》一書，係尹吉甫一生參與周代政治、征伐等史事的紀錄。葉達雄《詩經史料分析》；洪素娥《從詩經研求周代的史實》；劉逸文《詩經與西周史關係之研究》等均以《詩經》爲「史料」，從中推求周代之史實；潘秀玲《詩經存古史考辨——詩經與史記所載史事之比較》，比較《史記》和《詩經》相關史實記載之差異，以窺古史較信實可靠之面貌；鄭建忠探討詩篇反映的戰爭；任遵時《詩經地理考》研究詩篇中的地望，亦牽涉到周代的地域與爭戰諸事。

探討《詩經》表現的周代社會組織，有李義雄、陳妙、藍麗春、許詠雪等之學士論文；鄭均討論周代之農業；黃春臨、劉靜怡、金恕賢等探討周代婦女之婚姻與生活；季旭生研究吉禮；孫述山則蒐集《詩經》中的民俗資料。

七、就傳統經學「詩教」相關研究言：

「詩教」之發揮已非「現代詩經學」之主流，然除非完全否認中華文化之存在價值，否則傳統經學所具的「經世教化」之本質，恐亦無法完全拋棄，探討發揮《詩經》所具道德教化功能者，固非大眾卻也非毫無其人，

46 余培林，〈詩經複字句研究〉，中國詩經學會編，《第二屆詩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頁225-234。

47 龍宇純，〈詩經于以說〉，《（東海大學）中文學報》第12期（1998年12月），頁13-18。

48 季旭昇，〈詩經古義新證·自序〉（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7-20。季兄之研究方法與結果頗受大陸學者之肯定。

49 夏傳才，〈書評：《詩經古義新證》〉，《漢學研究》第16卷第1期（1998年6月），頁379。



戴君仁、唐海濤、洪龍秋、以及張元夫、甯榮璋、傅隸樸、黃漢宗等學者，均有相關論著；由於近年社會道德墮落的情況日趨嚴重，肯定傳統道德功能之論，稍有復興之勢，「詩教」之說在此大環境中，似亦有逐漸受重視之趨勢，除吳宏一、王禮卿、黃忠慎等學者外；陳新雄、文幸福、林葉連、林耀濱、彭維杰等均有探討或同意「詩教」價值、內容之篇章。此外；曾勤良《左傳引詩賦詩之詩教研究》探討「《詩經》與史傳間，人倫教化之關係」。⁵⁰ 彭武順從傳播學的角度，論證《詩經》政治性媒介的性質，具有「負載先王道德教訓訊息之媒介角色」的功能。⁵¹ 其實「詩教」乃《詩經》所以為「經」之本質，肯定其具此本質，並不意涵其無現代西洋文學概念下之「純文學」涵義，肯定「純文學」的研究者實不必有「唯我獨尊式」的非理性之過度排斥也。

八、就文藝賞析或寫作技巧等相關研究言：

此類研究是五四以來的主流，成績亦最為可觀，除前述語譯賞析諸作外，如裴祥瑞通論《詩經》的文藝性；朱孟庭研究《詩經》重章的藝術表現；周玉琴、文鈴蘭、林佳珍、陳靜俐等從文學角度，論析《詩經》中天文地理、草木鳥獸等意象傳達的感情；古添洪、劉儀芬、林奉仙、洪湘卿、蔡賽瑛、彭麗秋等研究探討「國風」之文藝性、民謠性及寫作、修辭、藝術、表現的技巧；蘇慧霜比較而辨別「二南」與屈《賦》之異同；孫小玉探討四本英譯《詩經》的譯文，保持了多少《詩經》原有的詩學本質與效果；簡良如《從「言志／言情」論詩經詩學》討論言志與言情二說的轉變過程，及對創作主體、創作形式與內容的影響；古添洪的《國風解題》強調沿著「民俗歌謠、里巷歌謠的態度」「脫離《詩序》的諫書態度」；⁵² 張學波《詩經篇旨通考》亦「以文理為歸」「求得古人作詩之本意」；⁵³ 施炳華《毛詩興義研究》在「揭示興的創作技巧」。⁵⁴ 王瑞蓮《詩經秦風篇研究》、吳萬鍾《詩經關雎篇之研究》、譚莉萍《詩經中三篇「揚之水」之研究》，雖綜合探討詩旨、訓詁、音韻、思想、

文學技巧等問題，實以文學態度為主要的研究者。王國瓊分析《詩經》中「棄婦詩」解讀紛歧的現象與可能之緣由。紀懿珉結合文字訓詁、古代禮儀與現代生物學知識，探討〈召南·鵲巢〉之內涵，以為主張「夫人有德」者，較具深刻之寓意。顏元叔以西洋「新批評」理論分析〈關雎〉篇寫作技巧，結果固可議，然學習瞭解西洋文學批評理論，以研究《詩經》諸相關問題，應是此後詩經學發展必須面對的問題。

九、就《詩經》博物學研究言：

這類著作有 8 篇論文，旨在探討詩文中出現的動植物與器物，器物如陳溫菊《詩經器物考釋》；動物方面有屏東野鳥學會網站〈詩經中的鳥〉一文（<http://wildmic.npu.edu.tw/bird/article14.htm>）；植物有耿煊《詩經中的經濟植物》、劉志清《詩經植物圖解》、潘富駿與趙婉茹的〈古老詩歌裡的花草樹木——詩經植物〉、及置於「臺灣林業試驗所網站」未署名的〈古文學裡的植物——詩經植物〉一文（<http://www.tfri.gov.tw/book/plant/1-3.htm>），臺北植物園另闢有「《詩經》植物園區」，此其成果也。

十、就經學史之研究言：

通代研究：林葉連《中國歷代詩經學》從社會概況、經學背景、學術取向、經學流派、代表作家及其學說入手，希望幫助讀者迅速進入詩經學的領域，因強調《詩序》不可廢，故批判朱子「淫詩說」最力。斷代（專家、專書）研究如下：

「先秦」：余培林《群經引詩考》蒐集論析諸經引《詩》之情形；林耀濱研究先秦儒家「詩教」之內涵。專家則多重在孔子、孟子與《詩》的關係：何定生論《詩經》與孔學的關係；文幸福論孔子之「詩教觀」；張亨從美學觀點討論《論語》論《詩》的涵義。論析《左傳》賦詩引詩者，有白中道、楊向時、奚敏芳、張素卿、曾勤良諸人，曾氏重在「詩教」的發揮、張文則以《左傳》為材料，以探析春秋時代的《詩》學相關活

50 曾勤良，《左傳引詩賦詩之詩教研究·自序》（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1。

51 彭武順，《詩在周代政治傳播中之應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頁114-115。

52 古添洪，《國風解題》（臺北：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2），頁254。

53 張學波，《詩經篇旨通考·自序》（臺北：廣東出版社，1976），頁1。

54 施炳華，《毛詩興義研究》（高雄：前程出版社，1990），頁329。

動，故謂之「稱詩」，以為從「聲曲」角度論，《詩》皆入樂。

「兩漢」：研究四家詩除王禮卿外，賴明德《毛詩考異》考訂四家之異文、異訓及《傳》《箋》之異同，並考核前賢論說之是非；施炳華有〈兩漢四家詩盛衰綜論〉。葉國良有〈詩三家說之輯佚與鑑別〉之作；林耀潏研究三家詩，謂其特色有「重視通經致用、多用正字正義、保存神話傳說、保存民俗風情、深具神秘色彩」等項。⁵⁵ 徐復觀、賴炎元、瞿紹汀、龔鵬程等分從校勘、疏證、思想內涵等方面研究《韓詩外傳》，賴氏更有「今註今譯」之作。糜文開和林金泉論析《齊詩》相關問題。王令樾討論《詩經》與「詩緯」的關係，徐富美探討「詩緯」的音韻現象。毛鄭的研究：《毛傳》：施炳華有釋例；趙逸文有訓詁條例的研究；傅隸樸有譯解；史玲玲有音訓辨證；丁惟汾有解故；潘重規、蘇瑩輝與林平和有敦煌卷子本的研究；文幸福論證古〈序〉出現在毛公之前，三家詩不如《毛詩》；盧國屏比較《爾雅》與《毛傳》，謂兩書性質有別，《爾雅》或早於《毛傳》成書；彭維杰探索〈序〉《傳》《箋》「溫柔敦厚」之義理，以為統攝於「倫理思想與教化觀二大端」；車行健借西洋「詮釋學」方法，以闡釋《傳》《箋》之間的互動關係；彭美玲以為鄭玄「以禮說詩」乃借禮教以發揮美刺、正變的詩教思想，過信《周禮》則其一短；賴炎元析論《鄭箋》解《詩》之條例；裴溥言與江乾益整理探析鄭玄《詩譜》。黃美瑛為漢《石經·詩經》的殘字作集證。

「六朝隋唐五代」：康義勇蒐集考論王肅之《詩》注、及鄭王之異；鄒純敏謂王肅以「人文思想」取代鄭玄的「神權思想」，係兩者解《詩》最大的不同；楊晉龍〈神統與聖統——鄭玄王肅「感生說」異解探義〉論證鄭、王同為兼綜「今古文」，兩者之別在鄭以「今文」為主，而王以「古文」為宗。張寶三比較《經典釋文·毛詩》與《毛詩正義》在文字、釋義、詩學觀念的得失與異同；又考論束皙〈補亡詩〉之意義；探討權德輿〈明經策問·毛詩問〉重「類」與「命」的觀點，及其蘊涵之經學和科舉的意義。邱惠芬分析《正義》處理《傳》、《箋》詮釋觀點差異的問題；許麗芳歸納《正義》

詮釋鄭《箋》的特點，以論證《正義》的詮釋觀點；黃錦鉉說明《正義》的特點。蔡信發評介《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侯美珍研究成伯璵《毛詩指說》、丁亞傑探析齊己《風騷旨格》的詩論之內容特點。丁履謙亦有《文選李善注引詩考》之作。

「宋代」：通論一代有黃忠慎《宋代詩經學》，唯僅及歐陽修、蘇轍、鄭樵、程大昌、朱子等五家，其後依此文而有《南宋三家詩經學》，專論鄭樵、程大昌、朱子等詩說之內涵與特點，以為諸說於當時已為說《詩》主流，然此說實有待商榷；陳文采蒐集論析宋代詩經學著作。蔣秋華論析二程子理學思想於詮解《詩》《書》時之影響。賴炎元有通論歐陽修詩經學之文；趙明媛探討歐陽修《詩本義》之詮釋觀、詩意觀，謂該書以《詩序》為標準，發揚「詩教」為主，並首度發覺到作品的語文意義；裴溥言以表格方式比較《詩本義》與朱子《詩集傳》之異同，論證歐陽修對朱子之影響；程元敏師除對王安石《詩經新義》輯佚的重大貢獻外，對王柏「刪《詩》」的原因、解《詩》的態度和方法，及宋代「淫詩說」的淵源與發展和影響，均有超出前賢的深入分析和貢獻。陳明義透過詮釋發展、著作內容，肯定蘇轍《詩集傳》在《詩經》詮釋學史上的價值與地位。戴君仁論析發抒朱子《詩集傳》的微旨；汪中斟補朱《傳》文字、說解之訛誤者；何澤恆分析朱子前後期說《詩》之差異；賴炎元亦有通論朱子詩經學之作；王春謀論朱子「淫詩說」於今人以文學觀點直解詩文之貢獻；陳美俐有《朱子詩集傳釋例》；許英龍討論《詩集傳》之成書經過、說詩手法與「淫詩說」的特點；李再熏疏通證明朱子詩經學之要義，並論其於中國與韓國之影響；林慶彰探討朱子說《詩》態度及其轉變之故，發現朱子之創見並不多；楊晉龍論述朱子《詩序辨說》之內容、意義及價值；謝信一有《由詩集傳叶韻說看朱子時代的語音現象》之作。郭麗娟探討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之成書、內容及對前人詩說之批評，進而論其書之成就與疏失。林惠勝、洪春音均比較朱子與呂祖謙說詩之異同，林文以為出身、詩教觀、情詩觀點等之不同，導致兩者解說分歧；洪文謂朱「變古」而呂「折衷」，朱在通假、虛詞、名物上多有創獲，呂在名物與典章制度上

55 林耀潏，《西漢三家詩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頁327-335。



成就較大，以影響論，宋代朱不如呂、元代以後呂不如朱。陳昉從生平、撰著經過、內容體例等探討王質《詩總聞》，謂其書具有「因人情求意」與「以賦體直解」的特點。程克雅比較朱子、嚴粲兩家「比興觀」之異同，以為朱子就詩歌語文形式發掘比興義蘊為較理想之詮釋型態，然因排斥美刺說，故不如嚴氏之觸類旁通而能發掘更豐富之意涵。

「元明」：明代詩經學研究實由林慶彰所帶動，除早期論證《申培詩說》乃王文祿所偽作的創見外，並探討朱謀瑋恢復漢學，肯定《詩序》的努力；及楊慎重漢學之詩經學研究；又與賈順先合編《楊慎研究資料彙編》，收錄有關楊慎詩經學研究之文；更翻譯日本學者村山吉廣探討鍾惺與郝敬詩經學研究的論文。通論一代的有楊晉龍《明代詩經學研究》打破傳統僅注重在詮釋上有創見者的討論方式，首創從傳播學的角度論證明代詩經學流衍發展的研究方法，進而指出漢學在明代發展的事實；又論析梁寅《詩演義》與朱子《詩集傳》不同之觀點、論證《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的異同與傳承關係，以見元明兩代詩經學發展的關聯性，並糾正顧炎武以來《大全》全剿《通釋》的誤說，也探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引用《化書》之意義。陳恆嵩亦論及《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的關係。劉人鵬與竺家寧均有分析陳第《毛詩古音考》成就與貢獻之文。蔣秋華探討郝敬、顧夢麟、陳子龍等在詩經學上的成就。陳文采討論鍾惺批點《詩經》之內容與價值。

「清代」：周浩治《清代詩經學》以胡適「《詩》為歌謠，決無深意在」一語為「金科玉律」，觀察清代詩經學演變之情形，謂傳統詩經學至清儒已集其大成，「吾人但述而不作可也」；⁵⁶周駿富有未完成之《清代詩經著述考》。專書則：亡友李光筠《詩經通義研究》，論此書於詩義闡發、援經證史、考訂名物典故之功，及受囿《詩序》等之缺失，並肯定其倡導漢學之影響。郭明華論述《毛詩稽古編》之內容及其偏頗之處，又以為此書優於朱鶴齡《詩經通義》。陳章錫疏解王夫之《詩廣傳》之義理，論證「情」在王氏思想的重要地位，並闡明王氏道德倫理之內涵，以見其內聖外王一貫之經世

致用的經學精神。文鈴蘭謂姚際恆《詩經通論》反映清初考訂辨偽之風氣，說解重在詩篇與章句間的變化和文藝賞析，雖不囿於前人，然亦有激烈偏頗不實之見；林慶彰與蔣秋華合編《姚際恆研究論集》，收錄姚氏相關研究之文。岑溢成通過《詩補傳》以研究戴震治經、解經的方法，發覺他「始終維持著『會通詩禮』的立場」。⁵⁷符濟梅以江有誥、高本漢、陳新雄等之《詩經》韻譜，與段玉裁之古韻「十七部」比較而訂正段氏之訛謬。李景瑜肯定崔述《讀風偶識》就詩言詩，但體貼經文，尋繹本義，求實證於典籍，以駁黜先儒說詩之附會迂曲的方式，反對其強調詩教、詩用等道德評論的崇經衛道之思想。黃忠慎論惠周惕之詩說傾向於漢學，故以美、刺分正變之論不無可議，雖有若干創獲，惟實無前賢所渲染之高明。鄭寶美依陳新雄「古韻三十二部」補訂孔廣森《詩聲分例》之訛闕。江乾益以陳壽祺、陳喬樞父子蒐集三家詩輯佚所得，探討兩漢詩經學之內涵，並述陳氏父子抉幽闡微、開闢今文學之功。林葉連《陳啓源胡承珙詩經研究》之作，論陳、胡二氏之詩學。劉邦治肯定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謹慎求實、徵引廣泛、不囿一家的態度，及以音求義原則、文學的探討等方法；洪文婷探討馬氏的詮釋態度與方式，謂其重視證據、不黨同伐異，重視政教功能，其獨到之處為：重視語文的結構意義和詩文脈絡，詮釋皆就作品中的詞句而解等三點。陳智賢以段玉裁、陳奐、馬瑞辰的著作為例，析論清儒以《說文》釋《詩》在訓詁上所造成的問題，謂有混淆文字學與訓詁學、缺乏方法學的反省、浮誇而偏離訓詁目的等三項缺失。張曉芬謂牟庭《詩切》雖有繁複之累、標新立異之失，然亦有以旁徵博引之方式考證字義，以俗語說詩、以韻語解詩、以喻意說詩的特點，及韻隨世變的認知等特色。林美蘭研究魏源《詩古微》之成書、版本及內容，謂其書旨在發揮今文學諫書傳統，以達通經致用之目的，考證〈泉水〉、〈竹竿〉、〈載馳〉為許穆所作，〈采芣〉三詩為宣王時事等為其特見，然以講微言大義，不免有牽強附會、前後矛盾處。李康範《方玉潤詩經原始研究》謂方氏治詩不顧《序》、《傳》，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刪賦比興三體，以為風

56 周浩治，《清代詩經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0），頁323。

57 岑溢成，《詩補傳與戴震解經方法》，同註5，頁213。



雅頌皆因「體」以定名，以四季分繫風、小雅、大雅、頌，以賦、比和寓言、事實分風雅，以為頌亦有正變，謂詩無淫詩等，為其書之特點。胡靜君借皮錫瑞《詩經通論》以窺三家詩遺說，及與毛《詩》之異同和優劣，以為皮氏論《詩》因囿於門戶，固多偏頗。另外賴貴三於焦循、曾美雲於毛奇齡、黃忠慎於朱彝尊、左松超於崔述等，均有探討之文。

「民國」：林慶彰探討民國初年反〈詩序〉成為「運動」的成因、內容與影響，謂受晚清今文學、西洋文化傳入、新文學運動的影響而起，於是反省《詩經》之本質，整理反〈序〉諸書，檢討重訂《詩》旨等。吳鳴（彭明輝）討論五四時期民歌採集與《詩經》研究的關係，謂使《詩經》擺脫美、刺的傳統，讓相信其間存有聖道王功之深義者、與視《詩經》為民歌者，均可各抒己見，而開啓研究的另一扇窗。洪國樑研究王國維詩經學，謂其常援禮以說《詩》，多能訂鄭玄之誤；論詩、樂、舞與禮的關係密切，而詩或本不為樂而作；以比較法推釋經義，為《詩》《書》訓詁一大發明；解《詩》《書》成語，旁徵於字形、音韻、文法、辭例而不拘於陳說，故多有勝出毛、鄭之上者；唯論〈商頌〉時代，似未注意後人重編或寫定之可能。侯美珍謂聞一多以社會學眼光，視《詩》為史料，本著現代人求真精神以解詩的方式，甚有價值，唯忽略文本而唯援引之西洋理論為準的，頗有穿鑿輕率之弊；又探討其運用佛洛伊德學說解詩的得失。王靜芳研究胡適《詩經》論著，以為胡適承繼反〈序〉傳統，充滿反省與批判精神，突破單一的詮釋方法，對於《詩經》多元角度與文法的研究，均有首倡之功，其對《詩序》固過分偏頗而缺乏學術尊重，所言亦欠缺完整、或有過於創新之虞，然亦潛藏無限研究的生機。江永川研究顧頡剛的文學史觀，謂其破舊開新的核心觀念乃樂歌文學史觀，顧氏即以民謠樂歌的觀點解《詩》，成為最早開拓《詩經》現代研究新方向的學者；丁亞傑謂顧氏從歌謠、情詩、史料等觀點研究《詩經》的成就，成為爾後研讀《詩經》的基本論述；洪國樑評論顧氏「重章複沓為樂師申述」觀點在論證上的不足，以為「重章互足」乃《詩經》重要之藝術手法。陳文采討論傅斯年的詩經學，謂其從史料考證

與歌謠採集的原則出發，加入語言學的分析歸納，和考古學的史料重建，雖有支離、矛盾、臆說之失，然論證商周同源與《詩》中「性、命」觀、天命思想的轉變則頗值得注意。金中樞以《詩經》為錢穆「天人合一觀」的論點作證。屈萬里之詩經學除張學波、林慶彰突顯其在詩旨、訓詁、傳播的重大影響外，洪國樑研究其「亦通」二十七例，以見屈氏治《詩》欲學者「會觀二義以求解」「需會通數義，方能見其全貌」之本意；蘇雪林稱美屈氏：「《詩經釋義》考證精審，要言不煩，嘉惠後學，靡有窮已」；謂糜文開與裴溥言之《詩經欣賞與研究》為「堂堂乎巨著」、王靜芝《詩經通釋》「精采」、劉明儀之譯作「甚為優美，且辭句鮮活，情趣溢洋，為《詩經》譯界之翹楚」。⁵⁸夏傳才以為趙制陽三本《詩經名著評介》以「有理有據」的「堅實基礎」，心平氣和的商榷諸家論著之是非，在詩經學史上甚有貢獻云。⁵⁹

「域外學者」：呂珍玉檢討高本漢（Bernhard Karlgern）《詩經注釋》字句訓詁的成績，以為其批評清儒濫用假借與語詞的貢獻最大，然亦有十六項缺失；董同龢、屈萬里、趙制陽等亦曾為文評論高氏在詩經學研究上的成就與缺失；陳新雄則譯介高本漢之《詩經》韻讀與擬音。翻譯問題：韓世芳和鄭臻討論龐德（Ezra Pound）；齊明探討威利（Arthur Waley）；古添洪評介理雅各（James Legge）與 Ezra Pound；孫小玉分析 James Legge、Bernhard Karlgern、Arthur Waley、Ezra Pound 等四本《詩經譯本》的翻譯，是否能如實的呈現《詩經》的原文意涵，並論因譯生晦等問題；陳慧樺則介紹王靖獻的《鐘鼓集》與「套語詩理論」。韓國則有金基喆《朝鮮正祖大王與丁若鏞問答詩經之研究》一文。林慶彰有評介日本村山吉廣與江口尚純合編《詩經研究文獻目錄》之作。

以上即臺灣近五十年來詩經學中，整體所呈現比較重要的內容現象，從前述討論當可瞭解臺灣詩經學有哪些成果？以及學者在哪一方面的研究較有貢獻？以下即檢討其特點與問題云。

結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58 蘇雪林，《詩經雜俎·自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2-3。

59 夏傳才，〈詩經名著評介序〉，趙制陽，《詩經名著評介》（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9），第3集，頁3。



臺灣詩經學的發展，從比較寬廣的角度論，誠如夏傳才所說，是「全方位、多層面」的研究，學者論學之際，多能彼此尊重，意氣之爭較少，表現出：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證據與邏輯分析；在研究態度上尊重與容忍不同觀點的表達；在學術成果上多元而稍有偏執。至其特點、問題與未來之展望，則如下所述：

一、臺灣詩經學的特點

臺灣近五十年的詩經學發展，在前述多元發展的基本原則下，呈現以下幾項特點：

1. 參與研究者的層面寬：

分析前述統計資料，在 685 位發表論著的學者中，學、碩士學位論文有 103 篇，非中文相關系所的學、碩士論文有 12 篇，佔 11.65%，其中包括社會系、歷史所、哲學所、外（英）文所、翻譯所、藝術所與新聞所。社會系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詩經》表現的社會狀態；歷史所則分析《詩經》中的史料，以見其呈現的時代社會之狀況；哲學所則從倫理學的角度以論禮樂教化之性質；外（英）文所與翻譯所，或研究修辭、或探討英譯《詩經》翻譯過程中產生的「因譯生訛」的問題、或比較不同文化的文學表現方式和內容的問題；藝術所則討論曲譜的問題；新聞所則從大眾傳播學的角度討論《詩經》的媒介性質與傳播的作用，所用之方法與切入的角度，頗有助於詩經學研究層面的突破。

另外植物學家耿煊、臺北植物園均有《詩經》植物之研究；屏東野鳥學會有關於《詩經》出現的鳥類之研究；理論作曲家劉德義則研究《詩經》曲譜與譜曲；職業醫師黃朝仁、高職教師劉明儀、高中教師甯榮璋、近現代文學研究者周錦等均有賞析著作；歷史學者杜正勝則有翻譯之作；謝敏聰更背著照相機去尋訪《詩經》的故地；⁶⁰ 在電腦網路上亦有高中學生的賞析文章等等，這些不同專長、不同職業、不同身分的研究者，共同構成臺灣詩經學複雜而不侷限於一家的龐大研究群，同時也可看出臺灣《詩經》的普及與喜好者層面之寬廣。

2. 研究涉及的内容廣：

根據「內容分析」和「成果與貢獻」兩節所述，可見臺灣學者在詩經學內容研究上的廣泛：無論是以倫理教化為主，而重視實踐要求的「傳統經學的研究」；或有關《詩經》、〈詩序〉的本質、篇章、作者、編者、詩樂關係、價值等問題探討的「基本問題的研究」；或以現代的美感經驗、藝術賞析、寫作技巧、文學批評等為主的「文學的研究」；或以《詩經》為歷史資料而探討有關史實、典章制度、日常器物、社會型態、風俗民情、感情婚姻、地理天文、動植物等相關的「歷史的研究」；或以文字、音韻、訓詁、文法為內容的「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或以目錄、版本、校讎、輯佚為主的「文獻學的研究」；或跨文化的翻譯、紹介、比較的「域外的研究」；或針對通代、斷代、專家、專書的內容、特色、優缺點、影響、傳播流衍等學術現象加以分析探討的「經學史的研究」等等，均有論著涉及，呈現的狀況是：全面性與多樣性。

3. 資料蒐集認真確實：

兩岸政治因素隔絕雙方的學術交流，戒嚴時期不但大陸學者的資料不易獲得，引用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甚至有「入獄坐牢」的危險性，但出版社與學者還是會設法將比較重要的成果以「隱諱方式」出版或引用，如：臺灣商務印書館將《朱熹》一書作者周予同改為周大同（1968）；高雄大眾書局將余冠英《詩經譯注》作者改成李度、臺北洪氏出版社則改為陳慎初（1977）；符濟梅論文引用王力諸文則稱「王君」（1976）；屈萬里《詩經釋義》中則諱稱「近人某氏說」。⁶¹ 另外博碩士論文取得不易，即使設於政治大學的社資中心也無法完整齊全。單篇論文的蒐集更不易，即使到 89 年複印大陸刊物，還會蓋上「匪偽資料，不得傳佈」的方塊大印。然而多數研究者多能不辭辛勞的搜羅引用，只要翻閱一下諸家論著，尤其是學位論文的「參考書目」，即可見學者蒐集資料之認真勤勞。

兩岸開放學術交流以後，臺灣學者重視相關資料蒐集的態度依然不變，林慶彰二本《經學論著目錄》的出版、開放大陸出版品的流通、電腦網站「圖書目錄檢索」、「論文目錄檢索」、「博碩士論文檢索」等系統的

60 謝敏聰，〈周族與西周王朝——《易經》、《詩經》、《書經》故地巡禮〉，《牛頓雜誌》第 15 卷第 7 期（1997 年 12 月），頁 108-121。

61 屈萬里，《詩經釋義》（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上冊，頁 6、頁 15、頁 19、頁 24。



普及性、及愈來愈方便的館際合作複印措施之實行等等因素的影響，臺灣學者論著中引用大陸及外國學者研究成果之情形，乃成為研究者之常態。如黃忠慎《詩經簡釋》引用高亨、于省吾、程俊英等大陸學者之文；余培林《詩經正詁》引有陳子展等十多家大陸學者之成果；張曉芬的碩士論文引用大陸出版或學者的論著七十餘種；文鈴蘭的博士論文除引有四十餘種大陸學者論著外，還引用了美國、韓國學者的論著；侯美珍研究聞一多的碩士論文因為涉及民俗學，除大陸學者的資料外，引用的外國相關資料也有十多種。這只是隨手舉出的論著，由此可見臺灣學者蒐集資料認真、博采的良好態度。

4. 研究內容漸趨精細：

早期學者可能基於學術推廣的需要，所以好寫一些無所不談而難有創見的通論性之文章，這類文章當然有其需要，此後也還會不斷的出現。不過就比較學術性的學位論文觀察，可以發現針對某一特定主題、或某一本專著的論文佔絕對多數。即使單篇論文，從統計資料上也可以看出針對作者、刪《詩》、《詩序》相關問題、比興問題、音韻研究、字詞與文法研究、單篇詩文賞析、專書、專家等較專業問題分析討論的文章，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學位論文中通論上下古今的也僅有林葉連一人而已；縱論某一個朝代的也不過有周浩治、周駿富、黃忠慎、楊晉龍、陳文采等 5 人而已；通論兩家以上者也只有林惠勝、林耀濱、陳智賢、洪春音、劉慶順、鄒純敏、程克雅等七篇論文。多數論文則研究諸如：意象、字詞、音韻、專著等較為單一的主題，至於譚莉萍研究三篇〈揚之水〉、吳萬鍾僅研究一篇〈關雎〉，集中研究的態度更為明顯。從這些現象可以看出臺灣詩經學逐漸趨於縮小範圍、單一主題的研究傾向。

以上四點即臺灣詩經學呈現的特點，這些特點在整個臺灣學術發展史上，因為同處在相同的時空之中，或許不是詩經學的領域內特有的現象，不過卻不能因此遂認為共相而置之不論，反可以證明詩經學之發展並未脫離整個臺灣的學術大環境。

二、臺灣詩經學的問題

「多元化」表示學術充分自由，也表示是一個沒有共識、各說各話的時代；由於缺乏學術權威，學者興趣因多元而易變，於是形成熱鬧有餘、深入專精不足的實況，臺灣詩經學在這畸形的現象下呈現的問題，大約有以下幾點：

1. 專業精神稍有不足：

觀察全數 685 位論著發表者中，僅一條者 448 人；二條者 90 人，佔作者人數 79 %。以博、碩士論，除學位論文或摘錄論文發表外，無其他新作者 74 人，佔博、碩士總人數 105 人的 70.48 %，這種專業養成教育無法落實的問題值得深思。另外有 45 位單書的作者；340 位獨篇論文的作者，除 1 條論著外無相關作品者，佔全部作者的 56.20 %，這種僅有一篇論著佔半數以上的情形，亦值得檢討。

推求上述現象之原因：一則學者一時興起，於是選取前人合乎己意之說而成文，實無專業之素養，因非興趣所在，遇上比較專業的問題時，只好放棄而不願繼續深入，其中以賞析類最多。再則以《詩經》為史料，此為五四以後多數學者之共見，既然視《詩經》為工具性之材料，而非研究主體，則其轉移研究方向實乃必然之勢，尤以研究史實、音韻或探討修辭、意象等文藝技巧者為多。

以《詩經》為史料的研究者，尚可置之不論，至於一時興起的作者，那種過分輕忽專業能力、及缺乏專業素養認知的心態，倒頗值得玩味。這種怪現象其實長期存在於臺灣學界，有不少人以為只要是中國人、認識中國字，就可以研究中國傳統的學術，不少文章實際上僅在重述或改寫前賢之見，並無任何新意。甚至因為專業精神不足，而出現抄襲之作，學者若一時不察，也就難免受欺了。例如：于維杰即誤引多抄襲程元敏《王柏之詩經學》內容之蔣勵材論述「淫詩」之文；⁶² 謝无量抄襲日本學者諸橋轍次《詩經研究》一事，則至今猶未被揭發。⁶³ 這類論著對詩經學之傳播固起作用，然於《詩經》之研究，如：內容之深入、主題之開發、方法

62 蔣勵材，〈國風「淫詩公案」述評〉，《東方雜誌》復刊第 10 卷第 11 期（1977 年 5 月），頁 71-78、第 10 卷第 12 期（1977 年 6 月），頁 70-76。其文中資料與論點多不出程師大作之外。

63 謝无量，《詩經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日本】諸橋轍次，《詩經研究》（東京：目黑書店，1912）。不但書名相同，謝氏第 1、2、3、4、5 章，依次即約諸橋書之第 3、（1 與 2）、5、4、6 章之文而成。另外徐英，《詩經學纂要》（上



之創新等整體研究水準之提昇，實無任何助益。熱忱有餘而專業瞭解不夠，正是臺灣詩經學界出現的首一問題。

2. 研究內容猶有偏向：

臺灣《詩經》研究的內容，範圍固然已非常廣泛，但就其研究主題而論，卻還有過度集中的現象，例如：基本問題、語譯賞析、語言文字學、兩漢、先秦、宋代、孔子、毛《傳》、鄭《箋》、朱子等的研究，篇數顯然較多。相對的有關文獻學、詩教、六朝、隋唐、五代、遼金朝、元代、明代、及某些前賢未論及而今存的專書、域外相關的研究（日本、韓國、越南、亞洲其他地區、俄國、歐洲、美洲等）、比較研究（不同文化的相似或相同主題的作品、不同時代的作品、相同時代不同地域與不同作者或家派的作品等等的比較）、譯介外國論著等方面，論著則明顯偏少，甚至還有無人研究的議題，這些比較缺乏學者投入的研究方向，也正是爾後《詩經》研究者可以加強及開發的論題。

考察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除受語文限制的域外相關研究，需加強不同語文的訓練，或培養專門的譯介人才或研究單位外，實與缺乏專業認知、以及研究方法未能突破有關，由於專業的投入不足，不但在研究方法上難以創新，在研究內容上也無法開出新議題，承襲舊方法和舊議題的方向以思考研究，成為部分學者理所當然的選擇，前賢重視者依舊受重視，前賢未注意者也同樣少有人留心，有待開發或需要重新檢討的論說和議題，依然存在，難見新意的相同主題、或不同主題而以相同方式研究的論著，也就難免一再出現了，這是臺灣詩經學界需要痛切檢討的問題。

3. 資料取用還可加強：

臺灣學者固非常重視資料的蒐集探討，然多僅注意及《詩經》專業領域的成果，能超出範圍而廣蒐其他領域之相關資料者，實不多見。這類資料除需要突破語文限制的域外學者之研究成果不計外，⁶⁴ 主要的有動植物與天文地理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及新出土的原始資料；和依據出土資料研究的古文字學與殷周上古史的成果。雖然自然科學學者的研究成果；與出土資料的判讀，甲、金、楚簡、漢簡等文字的瞭解，難以盡洽人意而猶有商榷之餘地，但研究者若能從專業認知上謹慎的加以檢證使用，還是具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且對學者眼界的開闊實大有幫助。

引用甲、金文資料以釋《詩》者，如屈萬里引金文以證「弔」為「淑」之訛；⁶⁵ 引甲骨文以證「育」當讀為「後」。⁶⁶ 楊樹達以金文證〈小雅·南山有臺〉「保艾」之「保」，義為「輔相」、〈大雅·江漢〉「王休」之「休」義為「賞賜」；⁶⁷ 又證〈魯頌·閟宮〉「克咸厥功」之「咸」義為「竟」或「終」。⁶⁸ 裘錫圭據甲、金文證〈鄭風·大叔于田〉之「暴虎」乃「不乘田車徒步搏虎」。⁶⁹ 李學勤根據出土新資料作出許多與《詩經》傳授有關的論證：如據「平山三器」銘文多引《詩經》之文，論證子夏傳《詩》，經曾申、李克、毛公一系之說，並非毫無根據；又從《毛詩》授受多在魯地，以論《詩·大序》和《禮記·樂記》間必然的關聯性；從古代書籍成書的狀態，謂應重新檢討〈商頌〉非商代詩的陳說。⁷⁰ 杜勇據金文材料以證西漢以前多認為「召伯即是召公奭」。⁷¹ 史念海考察《詩經》出現的原、隰、丘、阜、陵、岡、阿、京、泮、沮洳等的地形特徵。⁷²

海：中華書局，1936），頁 87-88 所述：敦厚、周慎、克制、勤儉等四端，亦與諸橋書頁 189-198 之論相似。

64 有關西方學者研究《詩經》的成果，可參見大陸學者王立娜：〈西方詩經學的形成與發展〉，中國詩經學會編，《第二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頁 14-27。

65 屈萬里，《詩經釋義·天保》，同註 61，下冊，頁 125。

66 屈萬里，《詩經詮釋·邶風·谷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 64。

67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增訂本），頁 16、頁 86。

68 見李學勤，《綴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220。

69 裘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 165。

70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臺北：駱駝出版社，影印 1984 年本），頁 79-89；《周易經傳溯源》（長春：長春出版社，1992），頁 80-90；《失落的文明》（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 104-106。

71 杜勇，《尚書周初八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124-140。

72 史念海，〈論兩周時期黃河流域的地理特徵〉，陝西歷史博物館編，《周文化論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頁 126-146。

何炳棣論證《詩經》中植物的種類、生長、特徵與氣候。⁷³張光直《商代文明》⁷⁴與杜正勝《周代城邦》、《古代社會與國家》等書中，⁷⁵多有涉及《詩經》詩旨、史事、訓詁等相關議題之詮解者。此類研究對詩經學頗有值得參考和討論的價值，而似未有注意及者。這些即是臺灣詩經學者選用資料之際，可以再加強注意或引證的成果。

4. 批判態度不盡客觀：

臺灣的詩經學者除第一代外，多數與五四並無直接的關聯；除傅斯年外與胡適的學術關係也不大，但由於授課教師、啟蒙參考書、學術風氣等交織下的無形影響，不少學者表現的態度，不是「胡適式」的視傳統為遺孽的「凡古皆非」；就是受胡適影響的「顧頡剛式」的視古人為笨伯的「凡疑皆好」，因此批評之際，不免有自視過高而導致自以為是的情形。

胡適自有一己之中心思想與主張，唯開卷讀《詩經》即要「推翻毛《傳》、唾棄鄭《箋》、土苴孔《疏》，一以己意造為《今箋新注》，且「自信此《箋》果成，當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又批評說：「漢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識最陋。他們把一部《詩經》都罩上烏煙瘴氣了」；⁷⁶又謂：「《詩經·國風》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寫，一般經學家多把這種普遍真摯的作品勉強拿來……牽強的解釋，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又說：要「用文學的眼光讀《詩》」，⁷⁷其視《詩經》為「文學」；反對漢儒以《詩經》為「經學」之論，外人自無置喙之餘地，然誠如柯慶明所言，胡適的某些觀點「或許是草率而錯誤，但是影響之大確是事實」。⁷⁸不少學者對傳統詩經學強調的倫理教化功能的「詩教」，所寄托的〈詩序〉之解說的批評，即承繼胡適之私見而

極盡輕薄之能事，如魏仲佑〈論《詩經》與《毛詩序》〉一文，⁷⁹即可見大量發揮此種輕薄私見之論。而以「文學眼光」讀《詩經》也成為多數學者共識，周浩治甚至奉之為「金科玉律」（《清代詩經學》，頁323），可見胡適的觀點與態度影響之大。

從比較多元的角度來看《詩經》的研究，只要是以《詩經》文本為主的研究，無論是現代追求詩文本意的「文學研究」；或是傳統注重倫理教化的「經學研究」，均可以各自成「學」，並沒有彼此無法共存的對立狀態，前述所舉吳宏一之文即有此看法，吳師更提醒學者不要以為「古人都愚昧，而今人皆聰明；古今說法的差異，主要還在於：鑑賞角度的不同」；又提醒學者應該考慮「舊說是否因為古今的風俗習尚有所不同，因而不容易被今人所體會、所瞭解」；並舉例說明今人以《禮記·深衣》之說而否定《毛傳·鄭風·子衿》解「青衿」為學子之服的說法，就像以杜鵑花不只臺灣大學纔有的理由，指稱呼臺大為「杜鵑花城」者為胡說一樣，⁸⁰由此可見承繼胡適觀點和態度的批評方式，值得再加檢討。龔鵬程更認為：「各個時代不同的解經人往往也有他們自己及時代關心的問題。他們讀經典、解釋經典，其實是透過經典表達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⁸¹瞭解這一點，則那些在自矜自高的心態下，不自覺而形成的輕薄言詞，也就可以休矣。

5. 研究方法尚可商榷：

根據上文論述可以同意陳平原「時至今日，過分貶低『文人文學』而高揚『民間文學』，仍是研究者必須面對的五四遺產」之言；⁸²臺灣不少學者所以反對「詩教」，並非真研究過或瞭解到「詩教」的問題，事實上多數是受到五四「高揚民間文學」觀點的影響而生，由

73 【美】何炳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69）。

74 【美】張光直著，毛小雨譯，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9。

75 杜正勝，《周代城邦》（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2年）。

76 吳奔星、李興華選編，《胡適詩話》（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1），頁3、頁399。

77 胡適，《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上冊，頁330、頁288。

78 柯慶明，〈中文系格局下的文學教育〉，《大學人文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同註30，頁223。

79 魏仲佑，〈論《詩經》與《毛詩序》〉，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傳統文學的現代詮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頁183-200。

80 吳宏一，《白話詩經》，同註40，第1冊，頁216-217、第2冊，頁234。

81 龔鵬程，《四十自述》，同註24，頁199-200。

82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202。



於成見在心，在研究方法上，不免就有周策縱批評胡適「在歷史中予取予捨」缺乏「尊重事實」態度的缺失。⁸³成見既深而無客觀超然的態度，所以多以前人之說為定論，難有創見，某些批評或論證，只是個人未經證實私見的宣傳或承襲前人意見的情緒性發洩，缺乏學術價值。如前舉魏仲佑之文，文中充斥諸如：遷就、迂遠、附會、支蔓、可笑、曲意說解、漫無標準、撲風捉影等等「以罵代證」的空話，不過再次傳達五四以來部分「反傳統」學者的情緒性語言而已；另外李辰冬《詩經》為尹吉甫之作的結論，實際上是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在詩篇的結果，⁸⁴文中之論證乃為其「想法」作宣傳，而非深求事實之真相。由於受此影響，也就少有人會思考現代學者將「國風」割裂而出的詮解方式；與傳統視《詩經》為整體的解說，是否有原則上的差異？順著「高揚民間文學」的思路而不斷延伸的研究方法，是否有「過正」的弊病？現代學者是否真的已經完全證明了「國風」內容絕對僅有男女私情？或證實《詩經》不可能有道德倫理教化的考慮？或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詩序〉毫無傳承而僅是衛宏一人的私見？如果研究之際能更有自信的對「刻板印象」下的權威諸說稍加反思，則論斷或許可以更具說服力、更加客觀可信，而且也更有可能開發出新的研究方法。

前舉林慶彰與夏傳才之文，皆肯定學習西洋相關理論以研究的方式，例如利用民俗學、神話學、新批評、詮釋學等；另外像讀者反應、系統研究、語言符號、意識心理、傳記歷史、經濟社會、階層性別、種族國族、政治宗教、價值倫理、後殖民主義……等等理論當然也可藉以研究《詩經》的本質、意義、價值。對西洋相關理論的學習、瞭解，絕不能忽視，但要利用西洋理論以詮解或挖掘《詩經》之內涵，則要考慮是否會產生一知半解式的「硬套」之失，深研西洋理論的柯慶明：「在深受西方理論的諸多啓發之餘，卻更感覺中國文學自有一己的主體存在，無法也不必削足適履，張冠李戴；除非必要總覺得能夠以中國自己的語言來詮釋中國自己的文學傳統時，就盡量用中國自己的語言」的經驗之談，⁸⁵或許可以提供《詩經》研究者在借用西洋理論之際做參

考。再者從某個角度論，現代詩經學僅知「文藝」而過分排斥「詩教」的偏頗，豈非也是過崇西洋理論以致「削足適履」的結果？

如前所述，臺灣研究《詩經》的學者，多數缺乏對權威性解說的反省，因而難以開創出新局，以筆者專業的詩經學史研究為例，多數僅注意到那些早經確定的名家或大家；研究方法也幾乎是千篇一律，無論研究那一朝代的那一個人，其論文大綱的內容，差別甚少，難見脫離舊有方法之限制者，這類研究只能見到詩經學史較具獨創性學者成就的一面，而難見諸如：那一家最流行？何以流行？如何流行？創見是否被接受？如何傳布？等等與傳播相關的問題。筆者私以為詩經學史的研究除舊有注重獨創學者的「詩經學詮釋史」的研究外；還應該有注重傳布與流行的「詩經學傳播史」的研究，亦即先蒐集當代經注、詩文集、小說、戲曲、雜記、史書；與後代相關書籍註解或正反面評論等記載引用的資料；再分析政治、教育、經濟、制度、社會、家庭、個人、出版等因素的影響，以論證當代《詩經》流傳及對後代影響的情況；並以為研究者需有「瞭解」的功夫，纔有資格做「批判」的工作，絕不能顛倒程序，否則論斷就很可能陷入主觀的成見而不自知。對此法有興趣之讀者，可以參考筆者《明代詩經學研究》一文。

分析臺灣五十年的《詩經》研究成果，主要可以歸納為上述五大問題，這些問題當然不必然出現在每一位學者身上，即使出現某些問題也不代表其研究成果毫無價值，從傳統經學的角度論，現代詩經學固有「內容學科化」與「價值虛無化」的傾向；但在視《詩經》為「史料文獻」與「文藝作品」的研究上，也開發或解決了一些以往未曾注意的問題。現代學者偏執的強調「史料」和「文藝」的價值，以及過分排斥傳統詩經學價值的「詩教」價值，誠然不是正確的態度，但也不能完全否認現代學者在字詞解釋、文學賞析、傳播普及等方面的貢獻。特點當然要保持或發揚，問題更要減少或解決，如此臺灣詩經學纔有可能朝更積極正面的方向發展，有關臺灣詩經學未來發展的遠景，就是下文要討論的問題。

83 【美】周策縱，〈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批判與貢獻〉，《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頁333。

84 丁邦新，〈可以休矣——李辰冬先生「現在發現的」兩篇「鑰匙詩」讀後〉，《文星》第79期（1964年5月），頁22-26。

85 柯慶明，〈中國文學的美感·序〉（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年），頁12。



三、臺灣詩經學的展望

臺灣詩經學未來的發展是否能更具生命力，研究是否能更深入，方法是否能更創新，自然與社會相關因素和研究者的態度密切相關。除針對前述特點的發揚深入、問題的改進創新等基本要求外，以下即分析社會與研究相關因素對臺灣詩經學發展可能的影響作用。

1. 社會相關背景因素

接受高等教育是人民的基本權益，已成臺灣社會的共識，政府於是開放大學院校的設立，大學院校不斷增加的結果，也促成中文相關系所的增長，以及錄取人數增多，根據前述的統計資料，可見以《詩經》為專業的研究者也跟著增多，這些因素對詩經學之發展，具有正面的意義。

「後現代」文化運動的興起，否定既存的價值觀，使人類逐漸趨向「虛無主義」，此現象引發不少知識份子的關心，因之重新肯定傳統文化的價值。其中和詩經學發展有關的是各種讀經團體的興起，以最具盛名的「華山講堂」為例，自 94 年以來參加讀經者，已經有超過一百萬人，這種普及的效果，當然可以視為研究經學潛在的人力資源，而詩經學也是其中之一。

二十世紀過度重視科技與經濟的結果，使得人類逐漸缺乏「人性」，為彌補此一缺失，於是有「通識教育」課程之設計，以加強學生的人文素養，由於《詩經》具有「興、觀、群、怨」的本質，具有陶冶人文精神的效果，不少教師即開設《詩經》課程，對《詩經》的傳播自然具有正面作用。

另外負面的因素則有：科技掛帥輕忽人文價值的庸俗成見、市場經濟以利為先的短視心態、狹隘本土思想興起而生的反中國情節、凡洋皆是凡新皆好的喜新厭舊心理。以上這些因素當然不僅對詩經學發展有影響，但卻也不能說和詩經學發展無關。

2. 研究相關內涵因素

臺灣已具有多元文化社會的特質，這種特質呈現在學術研究上，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避免「絕對二分法」的謬誤，開闊研究者的心靈，不以追新炫奇為高，不以注重傳統價值為落伍，客觀平等的看待各類研究。這種態度表現在詩經學上的作用，即是使愈來愈多的研究者不再偏執，瞭解《詩經》的多義性，打破視《詩經》為「民間情歌」的「金科玉律」之迷思，能以較開放的心

態，重新省思《詩經》研究的各種可能性，認真而直接的面對文本，脫離「反傳統」、「疑古」的桎梏，不再以成見為原則、以複誦前人成果為滿足。

四十多年來由於不同的教育內涵、立國精神、和吸收外來文化不同的關係，形成兩岸不同的學術視野，因此在研究方法、研究方向、基本研究態度上，皆有明顯的差別。至於臺灣缺乏的原始資料和考古資料，以及考古相關的研究成果，例如相關史實、字詞解釋等方面，如前所述，大陸學者部分成果對詩經學的助益甚大；兩岸學術會議的召開，更提供專業學者互相切磋的機會。開放兩岸學術文化的交流，使得兩岸學者可以互相觀摩、互相吸收對方的長處，甚至可以透過對比而更加瞭解自己研究的優缺點，這些對臺灣詩經學發展而言，自是有利的因素。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各種學科對二十世紀研究成果的反思，其中和詩經學相關的經學，以及語言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文學等人文與社會學科優缺點的分析，在研究方法、研究方向、研究態度等方面的檢討，均可以作為《詩經》研究者重要的參考資訊。尤其各家對詩經學成果的反省與改進意見，更可以提供研究者最直接、最確實的訊息。學者如果能注意這些相關的成果，用心加以揀擇吸收，截長補短，必定有助於個人研究的突破，甚至開發出新議題、新方法，這也是本文寫作的目的。

分析臺灣五十年來詩經學呈現的特點、問題與影響未來發展的相關因素，固然還存在一些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並不是無法突破的難題，只要學者稍加注意就有可能避免，尤其對「後現代」文化運動「價值虛無」的反思，以及反科技獨霸而重視人文素養思潮影響下的多元化思考與重視傳統價值的觀點，已得到臺灣許多知識分子的認同，這種改變當然對詩經學的發展具有正面的功能，因此無論就整體的研究大環境而言，或就實際的研究表現而論，都可以看出臺灣詩經學由基礎逐漸走向深入、由反傳統與疑古逐漸走向重新思考傳統價值、由視胡適引導下的研究為金科玉律而走向檢討瞭解其論點的是非、由單一的研究方法與觀點而走向多元與創新之途，這種趨勢即統計分析相關研究成果與相關影響因素後最終的結果，也是臺灣詩經學未來必然還會繼續發展的方向。